

2283

定南文史資料

第三輯

定南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K295.612129

H4

V.3

勘 误 表

页	行	字	误	正
11	17	1	一	杀
23	6	7	肿	踵
44	4	12	子	孑
48	15	倒2	并	便
51	倒7	12	愤	填
55	5	倒1	止喝	喝止
64	倒4	12	夏	复
86	倒11	9	单	并
88	倒7	1	面	而

从史实中受到

教益
树立
信心
建设
信心

陈泽理

九三·八·七

文章經國之
大業不朽之盛
事

史論、文讀書奉

宮南文史資料惠存鳴天書

湖北省博物館研究員鐘鳴天題詞

目 录

定南苏区简介·····	刘瑞林 (1)
太平军在定南·····	凌士光 (6)
五十年代定南县小学教师生活、工作回顾·····	谢立贤 (21)
五十年代定南县业余戏剧、曲艺创作 活动之回顾·····	廖振洲 (26)
松山石板桥·····	黄 政 (29)
洪洲唢呐·····	郭华钦 (34)
黄时沛小传·····	菊 如 (37)
一场没有结局的爱情·····	(43)
春风化雨忆师门·····	钟鸣天 (58)
“山牛客”·····	欧禹章 (65)
衣橱门带来的回忆·····	谢觉凡 (68)
日寇残害下的月子江·····	李房宗 (73)
东南军袭击月子乡公所·····	李房宗 (76)
羊陂歼匪记·····	(79)
关于县治迁移之我见·····	刘瑞林 (80)
粤东盐务局始末·····	廖振洲 (83)
“国大代表”竞选奇闻·····	(85)

定南苏区简介

刘 瑞 林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赣南、闽西的开辟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的成立，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当时的定南，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粤赣省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九二九年十月，定南八十岗的方学元在寻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定南县第一位中共党员。同月，他在八十岗同外地来定南指导革命活动的地下党员，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车步小组。接着，成立了定南县车步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定南县武装暴动总指挥部，并在全县各地设立了九个联络站。一九三〇年三月，定南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油汶湖支部诞生。

一九三〇年四月，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油汶湖乡苏维埃政府，管辖油汶湖、荸荠塘两个自然村，办事机构设在油汶湖，乡苏主席先后由魏爵马、魏宣犹、朱观旺担任。乡苏下设有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赤卫队等组织。农民协会的一切事务都由乡苏工作人员处理。

妇女会由各村妇女代表组成。战时发动妇女参加洗衣队、暴动队、运输队、慰劳队、救护队等组织，开展支前活动；平时调解家庭纠纷，组织妇女做军鞋（每两个妇女交一双），进识字班学文化，为红军家属代耕代种。

儿童团（15岁以下）由乡村中贫苦家庭出身的少年儿童组成。主要担负站岗、放哨、侦探、送信、宣传、慰劳红军等任务。他们肩扛红缨枪，英勇机智，一些坏人都逃不脱他们的眼睛，是红军和赤卫队的可靠耳目。

赤卫队是不穿军装的地方武装部队。队员由23至45岁的男女青壮年组成。他们担负保卫苏维埃政权和土地改革的胜利果实等任务。平时镇压当地土豪劣绅的反抗和破坏，战时配合红军游击队作战，随时补充红军队伍，是红军的后备力量。

油汶湖乡苏在寻乌县苏维埃政府领导下，采取“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以原耕为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抽近补远，适当搭配”的原则，开展了土改分田。由于乡苏管辖的范围大部分是山地，山林多，耕地少，山林又没有分配，所以，油汶湖乡平均每人只分得五担半谷田（旧时四担谷为一亩），由寻乌县苏维埃政府发土地证。多余的九担半谷田，就由乡苏干部和赤卫队员集体耕种，收获稻谷作为乡苏的办公费用。

为了减轻翻身农民的经济负担，农民每人每年只向油汶湖乡苏维埃政府缴壹斗谷（每斗谷折算25斤，四斗为一担）的公粮。乡苏分别在油汶湖、荸荠塘设有仓库，农民交来的公粮和打土豪缴获的粮食均放在这两个仓库里，每个仓库都放有几十担稻谷。这些粮食主要是给乡苏工作人员（一般10人左右）和游击队食用，以及在春荒时借给和救济群众。

乡苏流通的货币主要是铜板、银元。为了搞好苏区的经济建设，粉碎敌人对苏区的封锁，一九三一年春，油汶湖乡苏维埃政府曾发行过两次公债，一元银元换一元公债券，每

户要认购1至4元。通过宣传活动，每户都认购了伍元，超额完成了任务。

一九三一年三月，祖桂乡、兰田乡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

祖桂乡苏维埃政府管辖祖山、上桂、花罗嶂三个自然村（今属柱石乡）。乡苏政府先设在祖山里坑纸棚下，二十多天后，秘密搬到祖山围里。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刘云奇。

兰田乡苏维埃政府管辖兰本、白果前、正宫田三个自然村（解放后于58年、61年先后划给寻乌县管辖，属桂竹帽）。乡苏政府设在兰本的长废围。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先后由魏爵马（兼任）、邝世良担任。

乡苏维埃政权是由全乡选民依法选举的代表组成的乡苏维埃代表会议。

乡苏维埃代表会议执行中央、省、县、区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命令，负责本乡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卫生、治安、福利等各项工作。

一九三一年六月，在油汶湖召开了油汶湖乡、祖桂乡、兰田乡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定南县边区苏维埃政府”。出席大会的代表70余人，选举了刘金仁（寻乌人）为区苏主席，方学元（定南八十岗中圳人）为副主席。

定南县边区苏维埃政府隶属蕉、平、寻县苏维埃政府领导，管辖油汶湖乡苏、祖桂乡苏、兰田乡苏，办事机构设在油汶湖乡苏。

区苏维埃最高权力机关是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区苏维埃代表大会由全区各乡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的代表组成。

区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其选出的区执行委员会

行使其权力。

区执行委员会由执行委员及候补执行委员组成，设正、副主席各一人；下设土地、财政、劳动、军事、文化(教育)、卫生、工农检察、粮食内务、总务处等部门及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

区执行委员会设主席团，是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的权力执行机构，由区执行委员会推选7至11人组成，设正、副主席各一人。

定南县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一方面积极筹划全县性的武装暴动，为建立定南县苏维埃红色政权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计划在兰田乡进行土改分田，实行耕者有其田。

乡苏、区苏政府非常关心农民的吃饭问题。鼓励农民兴修水利，大力发展种植业、饲养业；发动农民组织变工组或变工队，进行生产互助。农业生产获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丰收。

苏区干部工作踏实。他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深入实际，艰苦奋斗，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区苏副主席方学元还亲自担任夜校教员，鼓励翻身农民学文化。

在定南东部诞生的定南边区苏维埃政府，其存在时间虽然短暂(1931年6月至1932年9月)，但她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苏区内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和精神风貌大为改观，出现了旧貌换新颜、“风景这边独好”的蓬勃生机，与邻近的国民党统治区形成鲜明的对比。特别是在守卫中央苏区南大门，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二、三次“围剿”的斗

争中，定南苏区人民英勇斗争，不怕牺牲，有近百名烈士血洒沃土，为党为人民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

资料依据：1.《中央苏区史研究文集》；2.《蕉平寻苏区史料汇编》；3.《定南人民民主革命时期斗争大事记》；4.《中央苏区政权建设研究》。

太平军在定南

凌 士 光

1851年（咸丰元年）1月，洪秀全、杨秀清等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武装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尔后，太平军围长沙、下岳阳、破九江、陷芜湖，于1853年（咸丰三年）3月攻克南京，并在此建都，改名天京。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太平军派出北伐、西征两支部队，北向威逼京畿，南向驰骋江南，唤起各族人民奋起响应，战斗烽火燃遍中华大地，汇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革命浪潮。

从1854年（咸丰四年）到1865年（同治四年），太平军（含其残部）13次进入定南，其中四次围攻厅城。其时大致可分为三段时期。第一段是太平军西征，翼王石达开经营江西时期，广东天地会从和平入境围攻定南厅城（今老城圩）；第二段是石达开率部脱离太平天国独立活动时途经定南；第三段是天京被清军攻陷后，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等率残部转战定南。

广东天地会围攻厅城

天地会又称三合会、三点会或洪门，是清朝初期产生，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在长江以南各地农村广为蔓延的秘密组织。其组织形式是所谓“山堂”。参加天地会就是参加

山堂。入会者要经过歃血、订盟、焚表、结科等形式。各个山堂有自己的头子，互相独立，没有隶属关系。金田起义时，广东、广西各地天地会纷纷揭竿而起，有的直接参加太平军，成为太平军的骨干力量；有的分散在各地开展武装斗争，与太平军遥相呼应。

1853年（咸丰三年）5月，太平军西征部队兵分两支。一支由豫王胡以晃率领，沿长江北岸经安徽入湖北活动；一支由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率领，沿长江南岸经江西入湖北活动，后又折回江西。两支部队与清军曾国藩（时任兵部侍郎）、胡林翼（时任湖北巡抚）所率湘军剧战一年多，湘军接连失利。这时，广东各地天地会顿趋活跃，东莞、花县、佛山、三水、惠阳等地天地会先后起义，攻占40余座府、州、县。1854年（咸丰四年）5月，各股起义力量相互配合进攻广州，围城半年之久。1855年（咸丰五年）夏，为声援太平军的武装斗争，这些天地会分头从乐昌、南雄、和平挥师北上进入湖南、江西，活动于湘南、赣南、赣中一带。是年秋，翼王石达开、冬官正丞相罗大纲率部由皖入赣，经营江西，与广东北上的各股天地会汇合，声威大振。同时，江西各地农民也纷纷揭竿，遍举义旗，或踊跃参军，或输送粮草。不到一年，除南昌、赣州等几座孤城仍为清军坚守外，江西13府中有8府50余州县均入太平军之手。太平军占了大半个江西，兵力发展到10余万人。

广东北上的各股天地会中，有一股惠州天地会，首领叫翟火姑。1854年（咸丰四年）5月，他率众参加围攻广州，随后陷佛山、博罗，又围攻惠州，未克，随即北上活动于河源、兴宁、龙川等地，与清军周旋两年之久，队伍由数百人

发展到6千有余。

1856年（咸丰六年）6月7日，翟统兵从和平直扑定南厅城。厅同知姚世恩闻讯，急忙采取措施巩固城防。他一面急调田心围、热水圳、下池、水西等地乡勇在厅城四周布防，一面在城内招募新兵，扩充团勇，并指派训导李志尧、照磨董沂、把总欧阳钊分兵把守东西南三座城门，令庠生廖榜、监生黄咸清领兵昼夜巡逻。同时加筑城墙，增设雉堞，搜刮民财，以充军需。还下令将城外民房悉数拆毁，以防天地会登城。

6月9日，天地会从上陵出发渡过老城河，将定南厅城围了个严严实密，旌旗帐幕遍布四野，钲鼓之声响彻霄汉。驻扎城郊的乡勇见天地会漫山遍野，锐不可当，未经交战就仓皇退回城内，紧闭城门不敢出战。天地会经过两天的准备，12日凌晨开始攻城。千余名突击队员以棉絮半幅蒙头，高架云梯强行登城。一天三次，均被守军炮石击退。连攻三天，伤亡数十人，由于城内防守严密，俱无效果。

同知姚世恩在围城之初，即向上告急，调驻守下历司（今历市镇）的清军绿营兵横冈营前来增援。14日，横冈营都司吉勒通阿率所部官兵及各堡乡勇1万余人，一路从泮贤、英嘴，一路从竹园、火夹水来援。天地会事先得到情报，即派兵在黄砂口设伏。当横冈营进到庙前冈、白芒嶺一带，天地会伏兵突然发起冲锋。吉勒通阿毫无防备，仓促应战，被天地会杀个丢盔弃甲，伤亡五百多，吉本人单枪匹马落荒而逃。各堡乡勇本是乌合之众，一见横冈营溃败，一哄而散，各自逃命。

城内军民闻知横冈营败讯，救援无望，更加惶惶不可终

日，同知姚世恩每日亲督部属巡城御守，不敢稍懈。天地会在取得庙前冈伏击胜利后，士气益发昂扬，17日起，连日以吕公车和云梯强行攻城。守军则以炮火、箭弩、砖石反击。对峙数日，互有伤亡，天地会始终无法登上城墙。28日，翟火姑改变战术，从城南文昌山旁开凿地道数十丈长，内置“棺材炮”。30日午夜，震天炮响，南城墙被炸坍丈余。在天地会开挖地道之初，城内守军即有发觉，预先作了防范。城墙刚炸裂，即动员数百军民以谷箩满装泥土，杂以砖瓦石块，填补缺口。天明，两军在城墙缺口展开激战，反复冲杀。天地会数度冲进缺口，均被守军击退，登城终未得逞。以后，天地会又在西城重掘地道，未曾掘成，就被守军采取对策破坏。这段时间，守军利用夜幕，每夜三更时分派出小股团勇出城骚扰，焚烧天地会营帐，使天地会疲惫不堪。

6月上旬，周玉衡（曾任龙南知县、赣州知府、江西按察使，1855年10月在吉安被太平军所杀）四子周炎，为报父仇，在龙南筹办团练，募勇2千余名。闻听定南厅城受围，自报奋勇纠集横冈营及五户、伯洪（今天花）、下历各堡乡勇，于7月14日进驻下历司。是时，翟火姑部将罗亚添、许礼仙正在天花一带劫富济贫。周炎意欲先剿罗、许部，再解厅城围，便于7月20日率兵向天花进击。行至瑶前、桥水，与许部遭遇。周炎团练均系新募，不堪一击，稍一接触即四散溃窜。许礼仙乘胜追击，直抵下历横冈营，并将营城团团围住，昼夜攻打。都司吉勒通阿本是天地会手下败将，见天地会骁勇善战，知难坚守，遂于24日夜突围逃往龙南。

以后，罗、许部分头由天花向宾光、太康、柏木、鹅公

等地活动，与当地起义农民肖龙章、安文彬、叶朝品、陈洪畴等会合，部队扩展到2万余人。

天地会围攻厅城2个多月，屡次强攻，均未奏效。时值盛夏酷暑，热气薰蒸，部队半染瘟疫，死者甚多，士气低落。翟火姑无奈，只好于8月18日撤围北上。罗亚添、许礼仙则从鹅公出发，在月子冈与翟火姑会齐后，经迳脑、小江前往信丰，配合翼王石达开部下先锋何名标围攻信丰县城。此后，翟火姑天地会正式并入太平军，称花旗，转战于赣、浙、闽、粤等省。

在翟火姑围城前后，受太平天国影响，定南时有小股反清农民起义发生，其中声势较大的且与太平军取得联系的有肖、安起义。肖龙章（天花羊角人）、安文彬（天花长桥人）在翟火姑围攻厅城时，即聚众起义，响应者近千人。罗亚添、许礼仙在天花活动时，肖、安与之联系，相互支援。天地会北上信丰后，肖、安趁姚世恩惊魂未定之际，率部由天花进占下历，10月初经樟田、丁坊进逼厅城。围城半月，屡次出击，但守军紧闭城门不予接战。10月15日深夜，大雨倾盆，天黑如墨，肖、安选派壮丁80多人，以绳索、云梯从厅城北面潜登城墙，爬上北楼。正欲斩关开门，不意被守门兵丁发觉。双方展开激战，及至天明。守军援兵赶到，把义军紧紧包围。义军寡不敌众，又无后援，死伤惨重，除10多人跳城逃生外，余皆阵亡。首战失利，肖、安无计可施，知取城无望，就主动撤围回天花去了。

肖、安义军在天花一带劫富济贫，捕杀劣绅，深得群众拥护，队伍不断壮大，使姚世恩寝食不安，必欲除之而后快。1857年（咸丰七年）1月，姚派庠生黄威煊、八品军功

黄凤翥率乡勇 2 百前往天花征剿。这个消息被肖、安事先侦悉，他们在官兵行军途中设下埋伏。当乡勇经火夹水、竹园行至鸦鹊隘（今油潭隘上）时，千余义军如猛虎下山直冲敌阵。乡勇惊惶失措，乱成一团，被义军杀得七零八落。不到一个时辰，战斗结束，黄咸煊逃得快，保住一条活命，黄凤翥在刀剑下丧生。

3 月初，肖、安应翟火姑相邀，统众北上与太平军合围信丰县城。下旬，姚世恩趁义军北上的机会，为报鸦鹊隘兵败之仇，纠集各堡乡勇 5 百之众，兵分五路进剿天花。25 日，姚自带兵勇百余名前往羊角洗劫，残杀肖姓群众 10 余人，烧毁肖姓房屋 1 百多间。肖龙章之兄肖石泰只身逃脱，奔赴鹅公向许礼仙求救。许礼仙系翟火姑部将，在围攻信丰县城时，翟、许不和，许欲杀翟，为翟部所不容，就自领部下千余人走避鹅公。肖石泰到鹅公向许礼仙哭请救兵，许当即发兵 5 百连夜启程，于 26 日清晨赶到羊角，将姚世恩住处团团围住。姚率兵勇东突西杀，拼死血战，最后力竭被义军擒，所带兵勇亦悉数被歼。

石达开部途经定南

1856 年（咸丰六年）9 月，太平天国发生内訌，北王韦昌辉残杀东王杨秀清及其亲朋部属 2 万余人。不久，天王洪秀全又诱杀韦昌辉，并詔请翼王石达开入京辅政。石进京后，得不到天王信任，且处处受洪氏兄弟猜忌排斥，故愤而出走，脱离天国，另立名号，自称“通军主将”。1857 年（咸丰七年）6 月，石达开私出天京，经安徽入江西招集旧

部10余万人，原拟西渡赣江，出湖南径回广西，但在丰城、吉水一线受到湘军顽强阻击，渡江未成，故转入赣东，后入浙江再南向福建。1858年（咸丰八年）10月，石部兵分两路，一路由国宗石镇吉、石镇常率领在闽粤边境活动；一路由检点付忠信、先锋何名标率领折回赣南，由长汀入石城、瑞金、会昌。11月，围攻安远，并分出小股兵力到鹤仔、上田等地活动。石部围攻安远县城两月不下，只好撤围，于1859年（咸丰九年）1月分路经定南、信丰、大余、崇义开向湖南。在此期间，石部7次进入定南县境。

1858年（咸丰八年）12月24日，太平军3千余人自鹤子向红朱潭（今洪州）开进，新任厅同知邱文光闻警，即派举生黄咸煊、从九邱培镛率城勇5百前往堵截，双方在红朱潭展开激战。起先，太平军先头部队兵力较少，处劣势，伤亡10余人。未几，太平军大队2千余人从鹤仔赶来增援，声势大振，杀得官兵大败，丢下1百多具尸体，狼狈向后逃窜。太平军乘胜掩杀，追至龙塘圩，因天色已晚，才鸣金收兵。官兵一口气越过遥溪迳跑到东山圩，见后无追兵，方驻脚稍息，正好赶上邱文光连夜派来的援兵，于是就在东山筑寨防守。第二天，太平军掉头向长富、大风、高湖、柱石方向活动，是夜，太平军拟由石头山、太康偷袭天花，抄官兵后路，当走至石头山时，与当地乡勇遭遇，太平军人地生疏，未探虚实，不敢恋战，退回到鹅公，及至天明，经龙塘、湘江向八十冈（今车步）转移，12月28日到月子冈，29日经迳脑到信丰小江。

12月31日，另一支太平军3千余人从安远阳佳寨进入龙头、南丰，第三天，他们兵分两支，一支进袭月子冈，一支

留驻南丰。厅同知邱文光闻报，亲率横冈营及各堡乡勇赴月子堵击，并飞檄驻东山圩的乡勇火速增援。是时，石达开西行先头部队已绕过信丰进至池江、大余，并攻下大余县城。这支太平军主要是借路经过，向大余靠拢，见官兵防堵甚严，尽量避免交锋。元月5日，太平军经大汶、半坑绕山路入信丰县境。

元月11日，邱文光指挥官兵千余人分三路向南丰进攻，驻南丰之太平军奋勇抵抗。由于地形不熟，战斗失利，伤亡10余人，被俘百余人，马匹军械损失甚多，太平军被迫撤出南丰，经龙头向信丰鹅叫转移。

元月25日，这支太平军四、五百人复从鹅叫入境至禾草湖，原拟向龙头活动，见官兵在龙头一带防守甚严，无隙可趁，第二天仍回信丰去了。

3月上旬，石达开主力部队已陆续越过大余、崇义进入湘南，其后续部队仍在信丰、定南边境活动以为犄角。3月21日，一支太平军从迳脑入境，次日进至大汶，27日，又有一支太平军从迳脑入境，28日，两支部队分头向月子冈进攻，邱文光派邱培镛率乡勇5百迎战，太平军霆击飙举，凌厉无前，杀得邱培镛溃不成军，死伤过半，余者争相逃命，退守神仙岭。与此同时，另一支太平军从安远阳佳寨入境直扑龙塘，3月30日进至天花、长桥，与从月子越过神仙岭的太平军在下历司合股后，31日进逼厅城。邱文光急忙四处调兵遣将，拼凑兵力3千余众，在火夹水和东岭两地与太平军展开血战。这两仗太平军均受挫，伤亡不小，退往天花，在天花又遭官兵夜袭，军仗器械又受损失，于是退往鹅公。邱文光挥师穷追，从穆湖、大风分两路合击，太平军支持不

住，4月5日分两路退却，一路经杨坑向广东小山，一路经留率向广东大坪。是时，国宗石镇吉、石镇常所率太平军正在兴宁、龙川沿赣粤边境向西挺进，从鹅公出去的太平军就是前去与他们会合。

翼王石达开统众10万离开江西后，在湘南、湘西、桂东与清军鏖战一年有余，屡战不利，锐气大挫，始终未打开局面，故军心不稳。且石部大半为皖、赣、粤人，入广西后，多不愿随。1860年下半年起，许多部下相继脱离东返，经江西、福建折而北上复归太平军。其中有两股途经定南。

1860年（咸丰十年）12月，石达开旧部军略朱衣点、彭大顺，率众5千余人，脱离石达开从广西东返，经大余、信丰、安远，1861年（咸丰十一年）元月13日进至龙头，第二天到鹅公，并在镇下（今镇田）与当地乡勇小有接触，然后退往长宁（今寻乌）向福建方向转移。

1861年（咸丰十一年）3月，石达开旧部统戎黄添理从广西东返，经南雄、信丰，4月23日入迳脑，再经龙塘、鹅公东入长宁。这两支过路的太平军沿途与乡勇虽有遭遇，但无伤亡。

李世贤、汪海洋转战定南

1864年（同治三年）6月，天王洪秀全服毒自尽，7月，天京陷落。之后，太平军余部由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率领，扶随幼天王洪天贵福、干王洪仁玕往南退却，在清军强大兵力前堵后击的情况下，不屈不挠，力撑残局。李、汪部先入江西，欲西进湖北，受阻未成，遂转向南趋，在赣、闽、

粤边界一带与清军周旋，虽号众10万，但分散成数股，独立流动作战，加上内部不和，不能协力同心，故无法挽救败局。10月，幼天王、干王在石城被清军擒获，随即杀害。翌年8月，李、汪内訌，汪海洋刺杀李世贤于广东镇平（今蕉岭），使太平军实力再次受挫。1866年（同治五年）2月，汪海洋在广东嘉应州（今梅县）战死，太平军嫡系部队全军覆灭。这段时期，太平军5次转战于定南县境，两次围攻厅城。

1864年（同治三年）秋，原在苏浙战场作战的侍王李世贤、利王朱兴隆、陪王谭富等太平军将领，率部从浙江转入江西，又从抚州、宁都南下，转到信丰、安远、定南、南雄等地，9月12日，利王朱兴隆部小股3百余人从小江进到迳脑，再到大汶，欲南攻下历司，厅同知窦鸿仪急忙调集各地乡勇千余名，在龙头、神仙岭、清塘圩（今车步楼背）等处设防，并派候选都司龙发扬带乡勇5百四路接应。太平军见官兵严阵以待，不敢妄动，次日退回小江。

13日，朱兴隆部另一支太平军5千余人，从安远光头寨入禾草湖，冲破增生郭传真所率乡勇在龙头的阻击，直扑月子冈。窦鸿仪飞檄横冈营都司姚元盛率部前往堵击，两军对阵，各有伤亡，激战半日，太平军不敢恋战，夺路向蝦蟆落井（今迳脑杨眉）转移，15日亦退向小江。

与此同时，正在南雄围城的侍王李世贤、末王陆顺德部，掉头东向经乌迳直攻龙南。9月22日，派出一支先头部队5百余人从汶龙经留村（今修建）直扑下历司。横冈营都司姚元盛慌忙从月子冈回援，太平军却不予交锋，转头南下于24日经庙前冈向厅城猛扑，将厅城团团包围。厅城军民已多次经历围城风险，故处变不惊，窦鸿仪一面严督城内团勇

加强巡逻防守，一面急调派往神仙岭和清塘圩两处守隘的官兵速返厅城救援。25日，太平军发起攻城，无奈登高器械短缺，靠少数勇士强登终不济事，反损失兵卒30余人。是夜，窦鸿仪为防太平军夜袭，精选兵勇2百余名缒下城墙，埋伏于城外疏林处。三更时分，太平军果真有小分队前来偷袭，被守军伏兵四下包围，两厢厮杀一个时辰，太平军失利，又损失兵卒30余人。

26日，李世贤大部队万余人及朱兴隆部万余人一起入境。李部从龙南兵分两路，一路从汶龙、留村攻下历司，一路从关西、车步攻天花；朱部从迳脑兵分三路，一路经月子攻下历司，一路经蕉坑攻天花，一路经龙塘趋鹅公。数万太平军蜂拥入境，旌旗蔽野，甲仗耀日，浩浩荡荡，煞是威武。然而，此时的太平军虽外表阵势威武，但士气低落，处处被动挨打，无复当年之勇。

27日，从汶龙入境的太平军在留村攻破谢姓围寨，焚烧寨内房屋10余间。进而围攻下历横冈营，都司姚元盛据城死守，未克。28日，这支太平军经竹园至庙前冈与围攻厅城的太平军合股，原拟继续攻城，不料，第二天情况突然变化，攻城计划落空。原来，厅同知窦鸿仪经过周密策划，决定先发制人，在东山、热水（今桥水）、高砂、水西等地救援乡勇到达预定位置时，29日倾城内兵勇向外突击，外地乡勇从后侧进攻，使太平军腹背受敌。一场血战在庙前冈展开，双方反复冲杀，拼死格斗，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激战竟日，太平军失利，伤亡一百余人，将领遗天福吕馥喜、瑚天义顾成祖、瑚天安陈义战歿。是夜，李世贤下令撤退，一路经杨婆山入广东下车，一路退天花，与该地太平军合股后走鹅

公，10月4日向龙川贝岭方向转移。这支太平军离境后，在李世贤、朱兴隆率领下东进闽南，在漳州、龙岩一带苦战半年多，终被清军闽浙总督左宗棠消灭于永定。

1865年（同治四年）5月，湘军提督鲍超所统霆字营（该营大半为太平军降卒），一因官府久欠军饷，二不愿入陕甘进剿回民起义，三怀念太平天国，在参将欧阳辉、游击罗三元的煽动下，全营5千余人在湖北金口哗变，南下投奔太平军。他们经江西袁州、湖南攸县至广东乐昌，再折向信丰。6月27日，霆营由信丰内江抵迳脑，厅同知王大枚闻报，急派乡勇5百驰赴月子冈堵截，28日，不等乡勇赶到，霆营就穿越月子冈、八十冈，经湖江至龙塘，29日，从胜前渡河到达鹅公，30日，即从留隍出境经龙川铁龙到兴宁，7月2日与康王汪海洋部会合。霆营途经定南，一路上遭各地乡勇袭扰，虽小有战斗，但无伤亡。霆营复归太平军后，随汪海洋转战粤赣边境，1866年（同治五年）2月，在清军10余万兵力的围剿下，于嘉应州与太平军同归于尽。

1865年（同治四年）上半年，康王汪海洋、偕王谭体元、佑王李远继所率太平军由赣东入闽西南活动半年有余，抵不住清军优势兵力的进剿，10月初从广东平远西进，9日由细坳入境到兴隆。厅同治王大枚急派监生廖显标、黄正衢各率乡勇5百分赴九曲、月光渡，沿河列栅严密防守。10日，太平军进到河边，一面结筏强渡，一面派出小分队从九洲偷渡，再从守军后侧发起进攻，消灭守河乡勇百余人。随即乘胜经天花直扑下历司横冈营。11日，另出奇兵由竹园驰攻厅城。

太平军来到城下，即发起强攻。王大枚严督城内军民，

不分男妇俱分堞防守，箭弩炮石俱下，打得太平军无法接近。攻城半日，太平军锋挫志疲，间道下池、雷公岌经樟田返回下历，与大股会合。是夜，从下池尾追而来的三亨乡勇，利用夜幕向太平军不断进行袭扰，使太平军整夜惊恐不定。天明，都司姚元盛率城内横冈营官兵鼓噪出击，城外乡勇侧面配合，前后夹击，太平军不支，遂撤围经留村西去龙南。是役，太平军灿天福何立起被擒，旋被杀害。

这时，追击太平军的湘军总兵王开琳率兵5千从广东赶到天花，13日向天花太平军发起进攻，这支太平军不予应战，经甲湖、蕉坑、八十冈向龙南关西撤退。一路上太平军不断与前来袭击的乡勇发生零星战斗，晋天福陈南绣阵亡，伤亡兵卒30余人。

10月15日，康王率部欲从龙南北进信丰，行至小江即遭到江西按察使席宝田所率清军的强大阻击，不能通过，无奈掉头回走龙南。为防太平军回窜，厅同知王大枚、总兵王开琳分别在白云殿和下池两处设重兵防堵。都司姚元盛领兵5百往来救应。19日，太平军从龙南罗坝反攻厅城，行至下池与湘军遭遇，太平军尽量避开，且战且走，20日绕道乐德、河田进入广东，22日攻占和平县城。这是太平军最后一次离境。

汪海洋部离境后，在和平、连平、龙南边境一带活动了一个半月，12月东进兴宁、嘉应州，1866年（同治五年）2月，左宗棠督四省兵力10万余人围攻嘉应州，7日城破，汪海洋部全军复灭。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坚持了16个春秋之后，虽然被清政府血腥地镇压下去了，但太平军以及定南农民义军的革命精神和光辉业绩，将永远彪炳定南史册，世代流传。

注 释

“厅”、“厅同知”：定南1659年（明隆庆三年）建县。1773年（清乾隆三十八年）改县为厅，称赣州分防府定南厅。厅行政长官称厅同知。

“训导”、“照磨”、“把总”：均为清代县署官吏。训导为主管教育的官吏；照磨为主管文书、照刷卷宗的官吏；把总为统领乡勇的武官。

“庠生”、“监生”、“增生”：明清时代称学校为庠，在校读书的生员称庠生，俗称秀才。生员分三种，学习成绩最好的叫廪生，次为增生，新入学的叫附生。中央朝廷办的学校叫国子监，凡在国子监读书或取得进国子监读书资格的人称监生。

“从九”、“八品军功”：清代官吏的等级分为九品，每品又分正、从两级，共十八级。知县为正七品，县署有的低级官吏不列入九品者叫“未入流”，但享受从九品待遇，故称从九。八品军功是指因战功而享受八品待遇的低级官吏。

“绿营兵横冈营”：清军初期建立的是以满、蒙两族为基础的“八旗”兵。入关后，为弥补兵力之不足，即招募汉人和收编汉族地主武装，组建绿营兵。绿营兵以营为建制单位，分驻全国各险隘要地。营以上统兵官员为提督，总兵，下设副将、参将、游击；营级为都司，下设守备、千总、把总等。横冈营原驻龙南太平堡（今龙南武当），1652年（清顺治九年）移驻定南下历司。

“翼王”、“豫王”、“国宗”：均为太平天国王爵封号。封王者，有的是开国元勋，有的是执掌朝纲的文臣，有

的是统率兵权的武将。国宗是天国初期封给天王及东、西、南、北、翼等五王本家兄弟的封号。

太平天国的丞相分为六官，即天、地、春、夏、秋、冬，各官又分正丞相、又正丞相、副丞相、又副丞相等四级，共二十四人。

太平天国除王爵之外，又有侯爵之封，侯爵分五等，即义、安、福、燕、豫，如本文中提到的瑚天义、瑚天安、灿天福、遗天福等。

“先锋”、“检点”、“军略”、“统戎”，均为太平军武官称号。

五十年代定南县小学教师 生活、工作回顾

谢立贤

建国初期，定南只有小学教师300多人。而由于定南人口居住分散，为照顾儿童就近上学，学校网分布很广，当时学校就有100多所。这300多位教师就分布在这100多所学校里任教。因此，除每乡一所完全小学有十多位教师外，其余村小学大都是一人一校或二人一校。

一、繁重的工作任务

那时，小学教师就一般完全小学来说，每人每周任课24节以上，村小一人一校或二人一校的，基本上全包下来了，（每周33节）。村小学没有炊事员，要教师自己挑水做饭、砍柴、种菜，有的学生家离校较远，教师还得为他们蒸中午饭。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政权建设、土地改革，剿匪清霸等中心工作的宣传任务，（如写标语、出黑板报、街头宣传），都由小学教师担任。为配合中心工作，每个乡村大都有文艺宣传队。这文艺宣传队的组织工作、导演，又非教师莫属。

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翻身，对文化学习要求迫

切。县区党政部门为满足其要求，号召各村组织农民扫盲夜校，学校老师又是当然的学习辅导员，有的村找不到合适的夜校教员，小学教师还得到夜校去授课。

那时的小学教师，每天从早到晚地工作，究竟每天工作多少小时，谁也说不清，而谁又不去计较。

教师是以教学为主的，社会工作任务虽然繁重，而教学却不敢马虎。教师大都挤时间备课，改作业。村小教师一般是课余一边蒸饭、一边看教材、批改作业。为琢磨教材中某个难题，或神情专注地处理作业，蒸饭锅里水烧干了、饭烧糊了、或炒菜时菜烧焦了，是常有的事。真正备课写教案，只能在深夜。一人一校教师，每天要看几本教材，（一至四年级）写五个教案、（每个教案、要写各个年级的教学目的、教学环节、作业布置等），要花多少精力，实在是无法计算啊！

二、紧张的学习生活

建国初期的小学教师，是由县人民政府招收录取的。这些教师多数不是师范学校毕业生。有部分是解放前的小学教师，有部分是高中、初中毕业生，有的还是小学程度。为迅速提高教师政治、业务水平，学习任务也很繁重。

为了系统地提高业务水平，大多数教师都参加了中师或师专函授，他们除完成函授学校布置的练习作业外，每两周还须在辅导站集中一次，由辅导员进行面授、解答习题中的问题。此外，隔周一次的教学观摩听课活动和政治学习也成为一项制度。而这两种活动均在星期六下午开始至星期日上午结束。为此，小学教师的星期天等于取消了。有些离辅

导站较远的教师苦笑着说：“我愿天天上课，不要星期天，我每逢星期天得走三、四十华里路啊！”。

平时工作那么苦，连星期天也得不到休息，寒暑假总该好好休息了吧，可是哪能呢。出于当时形势的需要，有些问题需集中解决，如肃反、整风、审干、反右等等，这个运动，那个运动，接踵而来。因此，寒暑假开始的第二天或第三天便自背被窝行李到县城集中学习了。那时学习的特点是时间长，一般四十五天的暑假，学习占去四十天，十五天的寒假，只有五天自己安排。集中学习期间没有什么节假日，五七年反右斗争时，传统隆重的春节也不能回家团聚。学习期间，提倡军化事，延安作风，生活紧张、严肃、艰苦。早上起来，集体整队到河边（北山小河）刷牙洗脸，晚上没有热水洗澡。女教师需用热水，只好到附近老依家买点热水。每日三餐吃饭时，各班整队到膳堂，八人一桌，待大家装好饭由值周员叫“开动”后才开始吃饭。

三、简陋荒漠的学校环境

解放初期因经济条件差，多数校舍都是解放前遗留下来的破房子。门窗腐朽、瓦面破漏、墙壁倾斜，至于设备，除破旧的黑板外，只有若干桌凳。有些课桌，还是用铁钉将一块长木板和四根木桩子钉起来的。每遇寒冬、师生便在这没有玻璃窗的教室里打着哆嗦上课。

村小学校址，为使本学区儿童上学路程不会相差太远，一般选择在较适中的地方。这就难免有些学校设在荒村僻址处。如月子乡有所学校便设在一个古庙里。学校附近稀落地住着几户人家，且都离校一、二里路。下午放学后，教师孤零

零一个，自然有难言之苦，而晚上偶尔又有土匪、虎狼出没，派了几位教师都不敢一人住校，晚饭后得邀附近同龄农民作伴过夜。三亨古地小学离辅导站三十多里，有段山路每当黄昏常有豺狼虎豹出没，该校教师每次到辅导站学习，都忘不了带一面铜锣，回校经过那段山路时，敲响铜锣作驱赶虎狼之用。上桂村小有位老师，从鹅公辅导站返校时适遇豺狼列队迎面走来，幸亏这位老师略知豺狼特性，闪在一旁躲避，才免遭袭击。

四、微薄的生活待遇

建国初由于国家经济困难，小学教师的生活待遇是低的。工资改革前以米代薪，一般是每月大米壹百市斤，最高的是新城小学校长谢石磷180市斤，平常好开玩笑的老师不叫谢校长、而叫代称“壹百捌”。工资改革时，小学校长最高工资也只有63元，有些教师还拿28元，有的代课教师只有18元。

五、可贵的精神支柱

当年的小学教师工作、学习任务那么繁重，生活待遇那么微薄，而工作态度却是那么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现在有些人看来似乎是不可理解。其精神支柱是什么呢？回忆起来，当时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实现美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追求那美好的未来，有着使不完的劲。一想到那金色的明天，什么苦呀、累呀都忘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为创造明天的快乐，幸福的生活，今天必须吃苦、先苦后甜，理所当然。那时候，苏联的保尔、中国的吴运铎、

万里长征的红军都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从他们身上生发出无穷的力量。

还有一点值得称道的是我们认为我们人生观是正确的，即今天所谓的人生价值是正确的，以当时时髦的话说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今天叫讲奉献。谁为社会作出最大的奉献，其人生价值最高。我们都觉得工作任务重，工作做得多，成绩好，为党为祖国为人民作出更多的奉献，心里踏实，生活充实，无上光荣，虽苦犹甘；相反，工作做得不多，未作出成绩，感到羞愧，似乎矮人一截；若谁对工作检轻怕重，投机取巧，对工作任务讨价还价，谁就要受到人们的指责、唾弃！

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精神支柱，在艰苦的环境中埋头苦干的力量源泉。

五十年代定南县业余戏剧、 曲艺创作活动之回顾

廖 振 洲

五十年代初期，人民政权刚刚建立，百废待举，各项工作十分繁忙。为了团结教育广大民众，为巩固和建设新生的人民政权而奋斗，中共定南县委对文艺宣传工作非常重视。1950年，县委直接从机关干部及中、小学教师中抽调人员，组建了定南县土地改革宣传队（1951年春改称定南县抗美援朝宣传队）。该队密切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巡回全县各地上演了大量的现代戏剧、歌舞、曲艺等节目，如《田园新歌》、《防空洞》、《白毛女》、《三世仇》、《鸭绿江畔》、《兄妹开荒》、《皆大欢喜》以及歌曲、山歌、快板等，收到了显著的宣传教育效果。与此同时，有力地推动了全县城乡文艺活动的开展。农村业余剧团，似如雨后春笋，陆续地建立起来了。据统计，五十年代末期，全县已有农村业余剧团131个，堪称盛况空前。

群众文艺活动的蓬勃开展，激发了我县业余戏剧、曲艺创作者的创作热情。他们的作品取材于本县农村，贴近时代，反映生活，讴歌现实，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不仅满足了本县当时众多业余剧团的上演需要，而且有些作品还在

地、省、国家级报刊发表，或由出版社发行单行本，为外地提供了部份文艺节目。

解放初期的定南县委书记彭山，带头从事业余创作，他编写的新剧《圈套》刊登于《赣南日报》。县文教科副科长杨思行，1950年与黄兆华合作的《破镜重圆》，1955年与黄政合作的《敲起警钟》，经县委讨论批准在全县上演。1957年，他单独创作的小歌剧《老董卖猪》在“江西文艺”发表。他的代表作《探亲娘》（县志误记为“探娘家”）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宝文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先后刊印成单行本在全国发行。同时他还创作了一些诗歌、散文，均在省级刊物发表。

黄政同志除与他人合作编写《敲起警钟》一剧之外，还深入生活，取材于本县，创作了中型话剧《前途与命运》、曲艺《快马加鞭齐向前》，分别获得赣南区第一次文学创作一等奖和二等奖，曲艺还发表于《江西文艺》。当时，我县农村除戏剧、舞蹈活动十分风行之外，山歌演唱也非常活跃。县里举行大型会议，经常组织大型山歌联唱，既生动地贯彻了会议精神，又活跃了文化生活，更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山歌手。这些大型的山歌联唱，均由黄政主持。联唱会上歌来歌去，对唱如流，很是激动人心。经他修改和创作的大量山歌，多次发表于《江西日报》和《赣南日报》。

解放初期，幻灯是先进的宣传工具。为了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在县文化馆工作的黄政同志根据每套幻灯片的内容，编写成“莲花”（即五句板）、山歌或快板，身背幻灯机，手提一小锣，深入山乡屋场，配合中心工作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有说有唱，有看有乐，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

廖云白创作的《莽撞鬼》、翁学韬创作的小剧《认错》，均分别获得地区文艺创作一、二等奖，并在省级刊物发表。

此外，还有《愤怒的地雷》、《龙嫂放鸡》等三十多个剧目和大量的民歌在全县各地上演，但因年事已久、记忆力差，说不出众多业余作者的尊姓大名，请谅。

总之，五十年代定南县的业余文艺创作活动，可谓发展蓬勃、昌盛空前。时在今日，回顾已往，无不为之兴奋。

定南古石板桥之最——

松山石板桥

黄正文

古代的桥梁，通常是以石块为主要材料建成的称石桥，以木材为主要材料建成的称木桥，以砖石砌桥墩，上铺木材的为混合桥，以悬空挂设缆绳或铁索，上铺木板的称悬索桥（又称天桥），以船只为活动桥墩，上铺木板的称为浮桥。古石板桥、大致又分为两种，一是在河两沿以石块砌桥台，河中起桥墩，同时，在桥墩之间用石块砌成园拱而连接成桥，此为石拱桥；一是先在河两沿起桥台，河中起桥墩，再用长条石块铺设在上面，此为石板桥。

松山石板桥，位于县属龙头乡蔡阳村（原名杨福墩村）之水头，松山下村之水口，为一墩两板之石板桥，两头之桥台及河中桥墩，均用大块青岗石砌成，上面共用十块长条花岗岩石块铺成桥面，每板为五块，桥全长四丈，桥面宽七尺，而最为难得的是，铺在桥东头那板五条长桥石，每块长达二丈一尺，宽为一尺三寸五分，厚为一尺八寸（西头那板五块长桥石，每块长为一丈三尺五寸）。据笔者之记忆所及和足迹所至，无论是县属各地，以及赣州地区南部一些县境和广东粤中粤北一带，大河小河的石板桥，确也见过和经过不

少，但铺设桥面之石块，每条长达二丈或超过两丈的，鄙人并未发现。故尔，平日言谈之间，我常在人前一再炫耀松山石板桥，不仅在定南，可说在更多的地方，堪称单板桥石长度之最，应当不为过之。

松山石板桥兴建于何年何月，已经难以查考。桥头原立有石碑五块，刻文记载建桥盛况，以及榜示乐捐建桥者的姓名，但于民国初年，兵乱中毁坏无存，而今仅存当时摆列在石碑前的石鼎一只和镶钳石碑的石块，遗憾的是上面并无文字。经向蔡阳村中年岁最高的几位长辈请教，大致都认为建桥是在清道光、咸丰年间，距今足有百大几年。老人们仍记得上代传说，当时搬运桥石的有关情节：两丈余长的桥石，又粗又重，每条都选拔二十个精壮汉子，用子母杠合力肩抬，为了扛运方便，大家都将拖在背后又长又粗的辫子，盘绕在头上，并用一根四五寸长的篾签，将辫子固稳在头上，这就好似妇女们头上的发髻一般，有的年青汉子，抬着桥石，还故意扭动腰肢，摇头摆手，逗引得路旁的围观者，捧腹大笑！

曾记得，我年幼时蔡阳村中有位能说善唱的黄英仕老人，常谈起有关建造松山石板桥的往事。据他说，建桥之初，原计划兴造一座两拱的石拱桥，村中士绅曾派专人前往广东五华，请来很有名气的石匠师傅。当大家四出寻找开采石块的石场，在蔡阳村西头一座尖顶的山峰上（石头寨的南面，叫石头堂的地方）发现不少石质优良的天然巨石时，石匠师傅惊喜得不禁拍手叫绝，连呼宝石宝石！石匠师傅站在巨石前沉思良久，蓦地提出：若将石拱桥改为石板桥，既省工又省钱。在场的士绅们权衡利弊，欣然首肯。

石头堂，当时建桥取石的地方，我曾去过多次。那片山上，至今仍留有不少巍巍大石，有昂然挺立的、有斜傲苍穹的、有俯首沉思的、有安卧地面的，真令人惊叹造物者的神奇。整座山内，还有不少的天然石洞，据云，从山北面的洞口进去，经数百米离奇曲折的洞道，可从山南面洞口出来。记得儿时，多次结伴去洞内捕捉石燕（一种蝙蝠，肉极嫩滑鲜美）。小伙伴们执着松明火把，紧挨着蹑足潜行。洞内宽度不一，有的宽如居室，有的狭如羊肠过时需爬行。我们钻进二、三十米之后，心中惧怕，不敢继续往前，因为听老人们说过，石洞内常藏有巨蛇猛兽。而今我想，石头寨这座山，要是能放在交通方便的地方，只要稍加修饰，便是一个很能吸引游客的观光胜地。

松山石板桥的桥板石，长达两丈有余，且能累累负重，经久而不断裂，确是古石板桥中难得的佳作。据说，当年的石匠师傅对桥石的质地和每块桥石的长度（跨度）以及应有的宽度和厚度，都作过精密的考究，制作时十分认真。眼看九块桥石顺利打成，第十块桥石也已放好石线，成功在望。当时，正值九月初一日，按规俗每月初一日、十五日，是石场打牙祭的日期，师傅满心高兴，准备亲自去上圩买些鱼肉回来，藉此庆贺十块桥石胜利打成。临行一再叮嘱几个徒弟，要将最后一块桥石细心开好。师傅走后，徒弟们心情激动，希望快些将石块打开，一不小心，竟使这第十块桥石断成两半，个个吓得惊恐万状！正在此时，师傅回到石场，眼看这最后一块就要大功告成的桥石，却毁在徒弟手中，气得将鱼肉抛在地上，伏在石上痛哭流涕。第十块桥石，虽然从新开劈，可是受到石场宽度长度的局限，比先前九块只能

簿一点和小一点，这真所谓凡事难得十全十美。

松山石板桥建成以后，无论是桥墩桥台或桥面，显得十分精密规整，桥面两旁还有扶手栏杆（今已毁损），在此山村偏野，确可蔚为壮观。当时，松山石板桥已成为信丰通往广东颇为重要的支道。家畜、土纸等运往广东，布匹、煤油、食盐等调往江西，全靠一条扁担、两只肩膀，每天从石板桥上往来的过客，为数不少。石桥西头，建有松山古庙，里面供奉着“五谷福主”（习俗称为专司五谷丰登的神）。每年六月，要用特制的小木桥抬着神像游村一遍，十月要朝神打醮，热闹非凡。庙前有苍苍古柏，庙右侧有参天古树两棵，一松一枫，相依并立，枝杈互为拥抱，似情深伉俪，如挚友良朋；树干比农家的大模篮还大，树根如盘龙飞舞伸向四方，树尾高过后山山顶。如果古树尚存，我想也堪称定南一奇，定会招来新闻界人士摄像采访。每值秋过冬临，枫叶彤红似火，松针苍翠娇艳，与蓝天白云相辉映，与古庙石桥相衬托，构成一幅绝妙的天然山色风光。古松古枫树下，长年设有茶摊，往来过客，无不欣然息脚，泡一壶“龙华茶”（龙头圩寨脑岭产的名茶），吸几口“石马烟”（龙南产名烟丝），面对这青山绿水，风光秀色，倾听松涛阵阵和流水潺潺，使人顿觉心胸怡悦，好似此地远离人世，大有身入桃源仙境之感。

沧海桑田，几经变故，松山石板桥桥头之古庙，早被拆除；两棵参天奇树，于十年浩劫期间，为兴修公路，均被砍倒。文革后期，蔡阳村大兴砍伐之风，不少外地副业人员包山砍伐。他们贪图方便，将箩大鼓大的坑筒，翻打在桥石上，再滚下河去，水运至湘口林场，西头那板左侧第一块桥

石，就这样被打断成两节掉下河去。不久，由于公路改线，在离石板桥不远的地方，另建新桥，承包建桥者竟在松山石板桥下放爆取石，巨大的爆破声浪和飞起的石块，又将东头一块二丈余长的桥石击断，至此，松山石板桥十块长桥石，仅留下八块。广大村民每谈及此，或从桥上经过，眼见断裂在河下的桥石残骸，无不感到深深的痛惜和由衷的义愤！

洪 洲 唢 呐

郭 华 钦

唢呐，是我国较为古老的民间乐器。其音量大、音色美、欢快明亮、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它既可独吹，亦可合奏，是民族乐队中不可缺少的乐器，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唢呐有大、中、小三种型号，其木管上的八个音孔意称“八仙”，多用红木挖成。民传“千日胡琴百日箫，喇叭（唢呐）不经三朝教。”貌似容易，其实不然。要真正吹好唢呐，从练指法到运气功，都须经过刻苦的磨练。

洪洲唢呐，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听上一辈人说，洪洲唢呐自安远传入。从民国初期（1913年）有人会吹唢呐，到郭爱彬老师傅（已故）这一代，洪洲村里师传徒，徒为师，代代相传，不但会吹的人多了，而且已有一定的演奏水平。初步统计，洪洲村里有近百人会演奏唢呐、二胡、笛子等乐器。平时，唢呐声响遍每个屋场，三五个人组成一个小乐队，吹拉弹唱，人们围坐一圈，尽情享乐。各方有请时，村里可同时组织五、六个水平较高的乐队外出应酬。郭爱彬、郭炳耀、郭登科、郭华标、郭和胜等，已是远近闻名的演奏师。郭爱彬老师傅的技巧更是超人一等，他不但能用嘴吹，而且能用鼻子吹；嘴吹时，用鼓腮换气，可连续不断吹两个小时；一九七八年，洪洲唢呐赴赣州地区参加民乐调演，他荣获表演奖，是年七十五高龄，农村中的婚丧喜事，旧时的朝神、拜

庙等习俗，无不请他；他所带的徒弟，遍及安（远）、定（南）、信（丰）等地；在他的传授下，洪洲唢呐人才辈出，先后有七人进专业剧团担任乐手，现仍有两人留团工作。一九九一年，县文化局、文化馆专程到洪洲录音、拍照，将洪洲村的民乐送赣州地区集成征用。

安、定、信三角地区（合子、龙塘、安西等地）有一民间风俗，凡娶亲嫁女、做生日、新居落成，必请唢呐演奏。娶亲时，唢呐随娶亲队伍到女家迎亲，逢村必吹，浩浩荡荡；新娘出门时，唢呐要接连三次到闺房门口迎亲，有的新娘“出嫁娇贵”哭嫁哭上一、二个小时，唢呐无奈只好在闺房门前就地等候，任其自然；若男方因故未请到唢呐，亲娘拒绝归亲之事也时有发生。不过，唢呐师傅也有他的许多规矩，如娶亲嫁女，在男方出门时要红包，在女方还亲时要红包，

“扫厨”要一块猪肉，归亲之日午宴“打厢”要收酒礼，送客也要红包，等等。随着经济的发展，洪洲唢呐早已冲出安定信三角地带，供不应求。一些个体音响专业户早已抓住这一信息，请洪洲唢呐师傅录制音带，广为出售赚钱。那些娶亲嫁女办喜事请不到洪洲唢呐的人家，即可买一块录好音的磁带，用“三用机”放音代替，倒也热闹非凡。洪洲唢呐所以闻名于世，讨人喜爱，其主要原因是其旋律优美、动听，

具有浓郁的民间小调风味，如《阴反阳》（…… 5 5 6
 2 3 | 1 6 2 1 6² | 2 2 2 5 6 | 3 ^ 6.² | 5 6 5 3 5 |
 2 3 5 2² | 3 . 6 5 1 | 6 3.² | 5 5 6 1 5 | 2 3 2² |
 3 . 6 5 1 | 6 6 5 1 | 6 3.² |) 就是一首流畅动听、

百听不厌的曲牌。与之相媲美的经常演奏的曲牌还有《倒水莲》、《随手调》、《九连环》、《大门开》等二十多首。

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洪洲唢呐吹奏的曲牌增加了现代乐曲的新内容。现在的洪洲唢呐不仅服务于民间风俗，而且为农村业余剧团的演出、乡村欢送新兵入伍等社会活动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增添了良好的气氛。洪洲唢呐将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代代相传。

黄时沛小传

菊 如

黄时沛，是清朝时期我县三名文进士之一。所谓进士是指明、清科举制度中，举人经过京城会试以及殿试的登第者。是当时国家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故一般的读书人为能考中进士而“十年窗下”拼命苦读。黄时沛当然也有其一番艰苦奋斗的历程。

—

黄时沛号石农（1759—1799），定南下历（现历市镇油潭村）人。他少年时，天资聪慧，才思敏捷，喜爱读书。当时，一般读书人必读的本子如《四书》、《五经》以及社会上流行的名家文选、著作，他几乎都读过，且理解能力强，记忆力好，好些书都能流利地全文背诵。有这么一个传说：一天傍晚，黄时沛正在书房中读书。突然窗外传来一阵叫喊“卖书啊，卖书啊”的叫卖声。他爱书，一听到这叫卖声就很自然循声走向书担前，并随手将担内的书翻阅了一遍。看见其中绝大多数书自己曾读过，只有那么一、二本陌生的。他本想将这一、二本书买来，但一问价钱太贵，买不起。但又爱不释手。于是，便想了一个办法：把卖书人留到家里住夜，好趁晚间借来读读。问题提出后卖书人看天色已

近黄昏，就同意了。第二天早饭后临走时，卖书人问黄时沛要不要买那二本书，并说价钱可以低廉些。黄时沛回答不买了。卖书人觉得奇怪，问他为什么，黄时沛回答说：“你那两本书我昨晚都通读了，内容我都记下来了”。卖书人不信，说：“你真的能记下内容么？考考你怎么样？即是说，由我在书内挑选一些章节，只告诉你开头一句，你就接着背下去。如能这样，我全担书无偿地送给你”。黄时沛坚定地说：“好，一言为定”。结果，确实是黄时沛胜了。不过黄时沛只要了那两本书，不是要他全担书。从此，乡人称他是“一目十行”的神童。

黄时沛写起诗文来，思路宽，内容实际，语言朴素流畅。他十多岁时，适逢村中的鸦鹊隘圩开圩演戏，村中父老知道他天资聪明，要他拟舞台两侧的楹联，他巧妙地针对演戏这一内容和附近的几个村落名，写道：“鸦鹊舞集翔，彩翻两行，欢动大竹园半迳；油潭歌清浊，笙箫一派，声闻小湾口横山”。（大竹园即现在的竹园村，半迳即泮贤，两地均在油潭隘上的上面；小湾口、横山即现在的天花乡的横山村）。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能写出这样内容切合，平仄合辙，对仗工整的对联，足见其天资的过人之处。难怪他能“童年入泮”（少年中秀才），“弱冠举于乡”（20岁中举人）。可惜在他中举以后因某些原因未能连袂考上进士。

二

黄时沛在参加京城会试时，曾“屡举不第”，但他没有灰心，而“看益粹”。等候机会，再行参试。清乾隆六十年

（公元1795年）正逢乾隆皇帝弘历让位给儿子颙琰（嘉庆帝）自称太上皇。为这一皇家庆典，朝廷于该年增加会试一科，历史上称乙卯恩科。趁此机会，黄时沛又一次上京。为表达这一次一定要考上，他写了一首《早发仙岭》的五言律诗。诗的全文是：

依旧襦衫冷，崎岖愧再由。
晓云随健足，细雨泽征裘。
草木三冬晚，风霜一剑收，
从来成国士，未许卧林邱。

诗作于当年春正月，此时为了参加己卯恩科会试，又一次路过“神仙岭”。他从描写当时的气候、环境及早晨的特色等来表达自己的信心和决心。

诗的开头两句从“屡举不第”仍然是一个举人而感到惭愧写起：“依旧襦衫冷，崎岖愧再由。”意思是：从考取举人后十多年了，仍然是举人，今天又从这神仙岭经过，内心上感到十分惭愧。“惭愧”是振作的前提，作者自愧，就表达了要认真对付这次考试的决心。

第三四句，从当时景色的描绘来表达这次赴考得中的信心。“晓云随健足，细雨泽征裘”，黎明的云彩，伴随我健步前进。蒙蒙的细雨洗涤着我的旧战袍，使之重放光彩，步伐健劲，战袍焕彩，必胜信心，跃然纸上。

第五、六句再从时令上写必然胜利的有利时机，“草木三冬晚，风霜一剑收”。时令，对于草木的生长和繁茂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三冬”这里指十二月，天寒地冻，对草木的生长是不利的，但冬天已过，冰雪已收，大地回春。东风吹，春雨滋，草木是一定会生意盎然，枝繁叶茂。在这个

“恩科”的好机会下，考上进士是很自然的了。

诗的最后两句：点明了虽曾“屡举不第”，而仍然再次赴考的原因。“从来成国士，未许卧林邱”。“国士”——国内的知名人士。纵看古今历史，凡是成为“国士”的人，都是敢于出外闯荡的，也就是说，要成“国士”是不允许长年累月拘守家园，而是要敢于走出偏僻的山乡，到广阔的天地里去闯。我立志要成“国士”，我要跳出这偏僻的山乡。

总之，全诗通过又一次路过神仙岭的心情和岭上景物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努力上进的决心和信心。这种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的青少年具有一定的意义。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在此表达的上进是为了“成国士”，当时的“国士”是为封建朝廷服务的。与我们今天青年的培养成为“红色接班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这一次，黄时沛终于考上了进士，并授为吏部文选司主事。

三

黄时沛在吏部任职时，因与当时朝廷中的实权派不合，一年后以父亲年老为由，呈请辞职还家。

黄时沛回到家中，一面侍奉父母，一方面给“后进课诗文”。在他所教的晚辈中，多有成就。侄儿黄立就就是嘉庆甲子科文举人。

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黄时沛受广东东莞县志局之聘，赴东莞修志。当时，他为了表达仕途的失意，写了《秋怀诗》五首。该诗传播颇广，县境内有些年老的知识分子，

还能背诵全文。现根据钟英贞老先生的回忆，缮录如下。

秋 怀 五 首

黄 时 沛

其 一

又看摇落到青枫，碧树萧萧玉露浓。
永夜高风悲鼓角，连江寒雨静鱼龙。
黄花水驿三千里，红叶霜林一万重。
落日孤城最萧飒，乡心凄断数声钟。

其 二

频年踪迹滞南园，卧病荒城早闭门。
长路风尘绕曙色，空闺刀尺怨黄昏。
草虫落叶声兼冷，瘴雨书灯梦未温。
飘泊天涯伤作客，钓竿谁识楚王孙。

其 三

策勋小技愧雕虫，羸马重来气尚雄。
天没衣痕瓜步雪，萧骚鞭影蓟门风。
狂歌自欲倾流辈，乞履仍羞托上公。
今日年华清镜里，疲裘高卧看秋空。

其 四

家住清溪水石边，绕门古木淡苍烟。
一畦溪畔行蔬圃，两顷山边种秫田。
禾黍香生黄叶落，菰蒲腴足菊花天。
故园盛事共相忆，南雁飞时意惘然。

其 五

回首关山夕照残，寂寥秋色集疏栏。
卷帘山影和人疲，依枕江声彻夜寒。
一笛楼台云黯淡，千家砧杵月阑珊。
凭高立尽西风劲，蚤首茫茫起百端。

注：录诗与钟老先生回忆的有个别字、词已经改动，改动的原因是笔者自认为比较切合原意，同时也为了求教于知情人。

修志结束后，黄时沛又还回家乡，第二年就去世了。这时年仅40岁。

黄时沛短短的一生，虽然没有做出什么惊人的成绩，但他的聪明才智、勤奋好学，以及不甘失败、追求上进的精神，还是赢得了县人的好评。定南厅志（道光版）就有这样的记载：“石农为人精敏明决，才具兼人。使假以年，文章经络不诚华国之达义。”

一场没有结局的爱情

——刘和珍与方其道

谢 一 彪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指使军警向在北京执政府门前请愿的群众开枪扫射，打死47人，重伤150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人们熟悉在此惨案中殉难的女烈士之一刘和珍，是被鲁迅先生称道过的女青年知识分子。这里，只披露一下，刘和珍与未婚夫方其道，在与反动势力斗争中纯真而坚贞的爱情生活。

洪 都 初 识

方其道，号致之，小名罗安，1893年出生于江西省定南县方屋排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4岁发蒙，由祖父方吉澍教读四书唐诗，13岁随舅父黄炳焕在信丰读书。

后来，罗安以学名方兴进入南昌陆军小学，与熊式辉、易简等人同班。继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与白崇禧、刘峙等人同班，因闹学潮被开除。于是，改名方其道，入江西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科。1915年“五九”国耻纪念日，方其道与法专全校同学参加示威游行，散发反对“二十一条”的传单，挨家挨户地进行反日宣传。

方其道由于生长在旧式封建家庭，年幼时即由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与李金凤结婚，生有一子，名方定中，高中毕业时，因患肺病早亡。1917年方其道以优异成绩从法专毕业，即写信提出解除与李金凤的包办婚姻。从此，他既不回定南老家，也不向家中要钱，孑然一身飘零于南昌等地，靠卖文度日，喜欢以“瘦痴”作为笔名，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曾任中学教师，《大江报》记者。有一年春节，他在南昌写了一首反映这种飘泊不定的凄凉生活的诗：

飘零身世几经年，橐笔生涯绝可怜。

南望浮云天境远，孤灯伴影泪潸然。

方其道在南昌时，曾住毛家园47号刘和珍家，与正在南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刘和珍相识。

刘和珍，号素予，原籍安徽歙县，1904年农历11月15日出生于南昌。刘和珍七八岁时，父亲死于安徽合肥，母亲带着她和她的二弟一妹在南昌一起生活。由于家境贫寒，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相继死去。1918年刘和珍考入女师后，也常年穿着破履烂衣。南昌多雨，道路泥泞，她没有皮鞋穿，赤着脚在街上行走，家中一切家务都是自己做。刘和珍每次从女师回家，都要去厨房里，将大块大块的木柴劈小，使母亲足够用一个星期。刘和珍从小养成吃苦耐劳、勤奋好学的优良品质。

刘和珍在女师时，大量阅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书刊，向同学们宣传民族独立和妇女解放的思想。并且秘密与江西省学生会取得联系，组织女师学生会，号召女师同学冲破封建旧礼教的束缚，与学校的种种禁锢条例作斗争，迫使女师修改了不准学生会客、通信、不准随意进出校门、不准参加社会活动的校规。刘和珍因此受到记过处分，但她却

坦然地对前来安慰她的同学说：“记个过算得了什么？我们今后能与男生一样进出校门，参加校外活动，这就好了。”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南昌学生也群起响应。刘和珍联合南昌各女校，拍电报声援北京的学生界，表示誓为其后盾。刘和珍还带领女师同学沿街搜缴焚烧日货，并且举行街头演讲，揭露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阴谋，控诉北洋军阀政府卖国媚外的罪行，不少人听后掩面而泣，在场的士兵也表示要加强训练，誓死抵御外侮。

1921年刘和珍再次带领女师同学向封建势力发起挑战。当时，女师学生都留长发，给学习和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刘和珍鼓励同学剪成短发，摆脱旧的生活方式。有些同学害怕学校和家长的责难。犹豫不决。刘和珍就带头将自己的长发剪成齐耳根的短发。在她的带动下，女师同学纷纷响应。封建卫道士认为这是洪水猛兽，大逆不道，都起来辱骂，校长也贴出布告，宣布开除刘和珍的学籍，由于全校学生的抗议，迫使校长收回成命。从此，南昌女生一律剪短发。

刘和珍经常与方其道一起讨论问题。1921年方其道任江西《中庸报》经理时，刘和珍常在该报上发表文章。10月10日，刘和珍与方其道、孙师毅等30多人，在南昌组织“觉悟社”，创办《时代之花》周刊，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新风尚，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积极鼓动和组织青年参加爱国运动。刘和珍担任“觉悟社”总务股干事兼《时代之花》主编，每期《时代之花》，她都负责写一篇稿子。后来，刘和珍又在女师创办了《江西女子师范周刊》，并担任主编，宣传妇女解放与爱国思想。这两个刊物，成为江西进步舆论

的重要阵地。共同的爱好和志向，将两颗心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不久，刘和珍与方其道由相爱到订婚，相约等刘和珍大学毕业后结婚。

劳 燕 分 飞

1921年冬，刘和珍与方其道订婚仅十日，由于方其道经常撰文明骂暗讽江西军阀，报馆被查封，本人也受到通缉。当局追捕甚急，方其道来不及与在校的刘和珍告别，只留了一张纸条，就仓皇离开南昌，投入粤军易简部，任上尉编修，转徙沪、湘、粤、桂等地。方其道虽然经常写信给刘和珍，但他的行踪飘忽不定，很难收到刘和珍的复信，有时，半年都得不到她的一点音讯。

1922年冬，粤军图赣失败，方其道绕海道仓皇返回南昌。刘和珍与方其道分别一年后遽然相见，惊喜交加。刘和珍深情地对方其道说：“你在南昌找个工作吧，这样我们能够朝夕相处了。”

“那我就再办报吧。”方其道尝够了颠沛流离之苦，忙回答。

然而，方其道在南昌没呆到五天，刘和珍得知当局又要缉捕他，忙叫人送来一封信，要他赶快离开，不必前去与她话别。方其道接信后，匆忙赴沪，旋入闽南赖世璜部。

1923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支部在南昌成立，刘和珍与赵醒侬、方志敏是最早的七位团员之一，刘和珍积极参加团组织举办的各种活动。

刘和珍在女师时，就有将来到北京投考大学的打算。因

此，她除了在校上课外，还去校外补习英语和数学，临毕业前夕，刘和珍觉得升学的文化程度差不多了，只有学费还没有着落。刘和珍准备从女师毕业后，去小学教书，攒几年工资作为学费。刘和珍把她的升学计划写信告诉了方其道。

正在闽南军中服役的方其道，经济上也颇为拮据，名义上月工资80元，实际上领不到，有时只有2元。尽管如此，方其道为了支助刘和珍上大学，平时省吃俭用。1923年夏，方其道从驻地步行90里到漳州，将累积半年的储蓄80元，通过邮局汇往南昌。刘和珍收到汇款后，非常高兴，将其作为升学的费用。

1923年秋，刘和珍在欧阳仙贻先生陪同下，来到北京，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语系。刘和珍写信对方其道说：“由于经济问题，我不敢作毕业的妄想，只是读一年算一年。”

1924年春，方其道又汇了100元去北京。刘和珍收到汇款后，为方其道冒着生命危险出没于枪林弹雨中为她挣得学费而感到心痛。刘和珍写信要他设法脱离军队生活，另谋出路。

方其道理解刘和珍的心情，不忍心让她为自己的安全担心，于是，拍了一封电报给刘和珍，准备暑假来北京与她商量将来的职业问题。

方其道抵北京后，告诉刘和珍说：“南昌一个报社聘我当新闻记者，只是月工资只有20元。”

刘和珍说：“只要命安全，钱少一点不要紧。”

方其道在北京呆了两个月，于该年秋天返回南昌。从1924年秋至1925年夏，方其道每月定期寄给刘和珍10元，有

时只有5元。刘和珍过惯了清贫的生活，又善于精打细算，钱虽然不多，也勉强过得去。

不 畏 强 暴

刘和珍入女师大后，除勤奋学习外，还经常去北京大学听李大钊讲《社会学》、《女权运动》，并在同学中广为传播。刘和珍喜欢读鲁迅的文章，鲁迅编辑的文艺刊物《莽原》，她每期必读。刘和珍由于思想进步，学习成绩优异，办事干练，善于团结同学，敬重师长，入学不到一年，就被选为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

1924年11月，刘和珍领导女师大学生开展驱杨运动。当时，女师大校长杨荫榆依附北洋军阀，推行封建奴化教育，对学生实行高压政策。刘和珍以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发表宣言，反对杨荫榆任女师大校长。刘和珍还率领女师大学生代表赴教育部，控诉杨荫榆的种种罪行，要求将其撤换。

杨荫榆曾向刘和珍疏通，遭到拒绝。于是，杨荫榆并假借评议会名义，宣布开除许广平、刘和珍等六名学生自治会委员的学籍。但刘和珍并不屈服，她在写给方其道的信中说：

“开除我的学籍倒没有什么，可恨的是杨荫榆不走，校务无法改进。”从此，杨荫榆不敢到女师大来，而女师大学生又不让刘和珍等六人离开学校，她们仍留在校内继续读书。

1925年夏，方其道因报馆开罪权贵被查封，再次来到北京，任女师大教务员。当时，刘和珍仍领导女师大学生进行驱杨斗争。

8日，新任教育部长章士钊在段祺瑞的支持下，唆使杨

荫榆雇佣武装警察围攻女师大，欲以武力驱逐刘和珍等人离校。不久，章士钊又下令解散女师大。北京还盛传军阀将以武力镇压女师大学生。一时谣言四起，风声鹤唳。刘和珍被警察殴打，但是并没有屈服，仍用薄席睡在校内的石阶上，继续坚持斗争。

方其道被阻在校外，不能入内，他担心刘和珍的安全，总在女师大门口徘徊。刘和珍看见后，忙出来对他说：“事情急转直下，将来或许要喋血校门，但我们暂不出门，你快离开吧。”起初，刘和珍每天还能用电话与方其道保持联系，告诉他有关校内的情况，后来，电话线被切断，校内饮食也断绝了。刘和珍与方其道虽近在咫尺，不能相见，无异天涯。

果然，8月22日，又发生刘百昭率领军警殴打女师大学生事件。方其道闻讯后，马上赶到女师大前门，被警察阻止，不能入内，旋入参政胡同，也被禁止通行，又转到报子街女师大补习科，恰遇教育部袁秘书入内，方道其得于进入女师大。时刘和珍正在一个院子里大哭，见方其道进来，忙收住泪对他说：“我不要紧，受伤很轻，但李桂生昏过去了。”说完，刘和珍带方其道进屋看望李桂生，只见李桂生遍体鳞伤，昏迷不醒，微有喘息。

几天后，女师大补习科的门禁稍微松弛了一些，方其道能够每天入内协助刘和珍办事。刘和珍虽然身陷重围，仍不松懈地进行驱杨斗争。当时，又谣传章士钊、杨荫榆将再雇警察强押女师大学生回原籍。刘和珍鼓励同学说：“他押回去，我们又回来，看他怎么办？”

后来，反对杨荫榆的女师大学生在宗帽胡同另外租赁房

屋作为临时校舍，一边上课，一边驱杨，鲁迅和一些进步教师曾去义务授课。刘和珍仍任劳任怨地工作。方其道去宗帽胡同见刘和珍时，她常把方其道带到一个房间里，将她应办的事情分一部分给他办。有时，刘和珍打电话约方其道去，方其道赶到之后，刘和珍已出去办事了，仅留下要他办的事情。

1925年11月，长达一年之久的驱杨运动，在社会进步力量的声援下，终于取得胜利。刘和珍等女师大学生由宗帽胡同迁回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原址宣告复校。

血 溅 京 华

“人常说，学生时期为最快乐之日，但是我不敢赞同。我相信世上永无快乐之日，而学生时期，亦多纷扰。

“比如吾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自我进校以来即永未见宁日。我不敢回忆我在校过去的的生活。

“现吾校已比较安静，我正预备静心求学。但是又风闻新教育总长马君武氏又正在企图扰乱教育界。若今日之安宁，我们又不能享受了。啊，这是何等可怕！”

驱杨运动取得胜利后，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减少了许多，刘和珍希望能够专心读书。这篇1926年3月16日写的题为《大学的社会生活》的英文作文，反映了刘和珍求学心切的强烈愿望。

刘和珍对方其道说：“办事最容易牺牲求学的光阴，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

“它既然耗费你求学的光阴，你为什么不辞去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职务呢？”方其道问道。

“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关系重大，不能随便弃职不干。”刘

和珍回答。

不久，女师大学生自治会要改选了。

方其道问刘和珍：“你还想不想再当主席？”

刘和珍说：“的确不想。但是，如果同学们信任，再选我，我也不推辞。”

由于刘和珍工作责任心重，办事公正，女师大学生仍选她任学生自治会主席。

刘和珍与方其道在一起的机会也更多了，但是，刘和珍求知欲强，没有在花前月下陶醉。她虽然常去方其道的住处，然而，并不呆很长时间，稍坐片刻便走。她常对方其道说：“光阴宝贵，稍纵即逝，不可虚掷，世界上最容易忘却光阴宝贵的便是谈情说爱了。读书为的是学知识，不是骗毕业证书，做装饰品。”

树欲静而风不止，短促的平静很快被严重的民族危机所扰乱。1926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公然以军舰掩护与冯玉祥国民军作战的奉军驶入天津大沽口，炮击守卫炮台的国民军，还借口国民军违背《辛丑条约》，纠集八国公使，向段祺瑞执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帝国主义悍然侵犯中国主权的罪恶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

刘和珍听说这消息后，义愤愤膺，她劝方其道说：“你再去军队中服役吧！”

“你以前劝我脱离军队，现在又要我再入军籍，这是为什么呢？”方其道问道。

“外抗强权，内除国贼，非有枪不行。我毕业后，也要到军队中来当你的秘书，共同品尝沙场的滋味。”刘和珍气愤地说。

“你是学师范的，应该去教书。”方其道劝道。

刘和珍却说：“军阀不倒，教育事业搞不好。打倒军阀以后，我再当教员也不迟。”

3月17日下午3时，北京200多所学校，400多个团体的代表在北大三院召开了紧急会议，刘和珍作为女师大的学生代表也参加了大会。会上决定第二天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国民大会，抗议八国通牒。

晚上，刘和珍打电话约方其道第二天一起去参加天安门的国民大会。方其道知道她近几天身体不适，忙问：“你身体好了没有？”

“还有些伤风呕吐。”刘和珍回答。

“你身体欠佳，明天就不要去了。”方其道劝道。

“不，明天一定去。”刘和珍坚决地说。

3月18日，天空阴沉沉的，让人喘不过气来，不久，飘起了鹅毛大雪。刘和珍虽患感冒，仍起得很早，匆忙吃过早饭后，便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请教务处处长林语堂准停课一天。随后，刘和珍直奔各学生寝室，通知各班集合，整队前往天安门。刘和珍亲自高举女师大白底黑字的校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上午10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北京近200个团体代表与各校学生5000余人，在天安门举行了国民大会。李大钊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大家发扬“五四”精神，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集会群众异常愤怒，一致通过驳回最后通牒、驱逐八国公使等六项决议。

下午1时，天安门广场集会结束后，群众开始向执政

府请愿游行。李大钊手擎红旗，走在队伍的前面。游行队伍一路高唱《国民革命歌》，经东长安街、东单，向执政府所在地铁狮子胡同前进。刘和珍带领女师大学生沿途高喊：“驳复列强最后通牒”、“废除辛丑条约”、“驱逐署名最后通牒的各国公使”等口号，并且散发传单，向市民进行宣传鼓动。当请愿群众走到国务院东辕门外时，女师大的队伍挤到了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方其道稍迟一些到天安门，时国民大会已经开始，他在人群中没有找到刘和珍。会后，他也参加游行，抵铁狮子胡同后，才远远地看见站在执政府门口东边最前面的刘和珍。由于人群拥挤，相隔很远，方其道又想到以后彼此见面谈话的机会很多，因此，没有挤到前面去。

请愿群众秩序井然地站在执政府院外的大草坪上，推举五名代表与卫兵交涉，要求见总理贾德耀，遭到无理拒绝，于是，决定前往吉北胡同找段祺瑞。突然，从执政府北边的大门里涌出几百个手执大刀、铁棍的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恣意追打，埋伏在执政府旁边的300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在刺耳的警笛的指挥下，兽性大发，开枪扫射，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始了。

人群纷纷涌向执政府的大铁门，军警迅速地将大门关闭。群众在门口与之展开搏斗，大门被挤开一条缝。由于人群不断往外挤，前面的人被后面的人挤倒在地上，层层叠叠地压着，有的被踩断了肋骨，也有的窒息死亡。

正在执政府前的刘和珍听见枪声，见人群大乱，忙往后跑，不幸被子弹击中后背，斜穿心肺，倒在地上，顿时血如泉涌，脸色苍白。刘和珍忍着剧痛，仍咬着牙往外爬。同去

的张静淑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扶她。军警见状，骂道：“你还要扶她呀。”追上来猛击张静淑的腰上一棍。刘和珍只觉得眼前发黑，天旋地转，忙用力推开张静淑，用微弱的声音说：“你走吧，你走吧，不要管我了。”说完，便倒在血泊中。张静淑也身中四弹倒在地上，由于抢救及时，才幸免一死。杨德群见二位同学中弹倒下，奋力冲上去救护，也被子弹击中右肩，倒在雪地上，但她仍挣扎着想坐起来去拉刘和珍，军警用铁棍猛击她的头部和胸部，后来在医院里停止了呼吸，军警见刘和珍还微有气息，又用铁棍在她的身上乱击，这位年仅22岁的热血女青年，为了祖国的独立、自由，洒尽了最后一滴热血。

经过半个小时的大屠杀，军警发射了1000多颗罪恶的子弹，执政府门前的草坪上，死伤枕藉，血肉横飞。灭绝人性的刽子手还恣意剥夺死者的衣服、钱财。

泣 诉 黄 泉

方其道在离西辕门很近的地方听见枪声，见群众纷纷倒地，想起正在执政府门前的刘和珍，心里非常焦急，忙经铁狮子胡同绕到东辕门外，前去寻找刘和珍。

女师大的学生雷瑜见到慌忙赶来的方其道，问道：“看见刘和珍了吗？”

“没有。”方其道摇头回答。

“刘和珍肯定还没出来，你在街上再稍候一下。”雷瑜说。

方其道继续往前走。等他赶到执政府门前，人已走散。方

其道欲入内探望，被制止。只好赶回女师大探听消息，女师大的学生都集结在校门口翘首等候刘和珍归来。方其道有种不祥的预感，复折回执政府。恰遇检查官入内开棺验尸，方其道乃尾随而入。医生检查了刘和珍的脉膊，已停止呼吸。方其道见状，大声痛哭，被卫兵厉声止喝。

当天晚上，女师大三个学生租了一部汽车前往执政府收尸。卫兵见是三个女学生，立即凶相毕露，不准她们三人下车，还用刺刀敲着汽车说：“你们再敢来，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一齐来，就一锅熬。”

19日，天下着大雪。女师大学生办妥了收尸手续，再次来到执政府。这时刘和珍的尸体已血肉模糊，无法辨认，直到从刘和珍的口袋里翻出她的名片，才知道是她。刘和珍的尸体百孔千疮，体无完肤，血仍往外流。她们将刘和珍和杨德群两位女烈士的尸体运回了女师大。

第二天，女师大学生为两位女烈士重新举行棺殓。刘和珍全身被包裹在红绫里，静卧在棺内，口合目闭，脸色淡白，神情安祥。方其道仰天痛哭，亲自将他俩合照的像片放在刘和珍的脸前。当无情的棺盖盖上时，大礼堂里的哭声愈加凄凉。

25日，女师大举行盛大的追悼会。礼堂正中央悬挂着两位女烈士的殉难遗影和生前遗容。在一张8寸大的像片上，印着刘和珍殉难时侧卧着的遗体，她洁白的背上，离右边腰不远，有一个黑漆漆的弹孔，四周是散射状的黑血。与遗影并列的是刘和珍的生前遗容，她身穿一件淡雅的布旗袍，疏披的短发下，现出微胖的脸，露出天真，活泼、纯洁的微笑。在大礼堂右边的玻璃柜里，陈列着已变成黑褐色的血衣、血裤和

血鞋，这是刘和珍生前穿的最后一套衣服。庄严的大礼堂里，挂满了各界敬送的花圈和挽联。方其道亲笔书写的挽联，十分醒目。

生未同衾，死难同穴，疆场空有约，六载订婚成一梦，
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劳燕惜分飞，白官溅血泣黄泉。

追悼会先是致哀词，然后介绍两位烈士生前事迹和遇难经过，最后由全体师生举行公祭。当学生代表宣读祭文时，大厅里一片抽泣哀恸之声。方其道泪如雨下，痛不欲生。

后来，方其道仍留在女师大教务处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这里的一景一物都勾起他对往事的痛苦回忆。不久，方其道南下上海，重操旧业，继续以卖文为生，旋又返回南昌办报。故地重游，与刘和珍的疆场之约历历如绘，为了实现刘和珍的遗愿，方其道决定再次弃笔从戎。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后，开始北伐，方其道在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部任书记兼中校秘书。从此，方其道一直追随刘峙左右，长达13年。然而，紧张的戎马生活，无法驱散他对刘和珍的怀念。北伐军进驻徐州时，方其道写了一首悲伤的诗：

频年未了从军债，依旧风尘拂面来。
好景徒增怀侣泪，俸钱十万又何为？

1930年刘峙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兼开封绥靖主任时，方其道任河南省民报社社长、河南省党部委员、战地服务团团

长、河南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官场的升迁，代替不了他对刘和珍的思恋。方其道一如既往地经济上资助刘和珍的弟弟刘和理上大学。刘和理从武汉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南昌教书。

1939年刘峙调任重庆卫戍总司令，方其道任该部少将军法处处长。1940年因处决一名政治犯时，与刘峙意见不合，发生争吵，方其道愤而辞职返赣。

方其道随北伐军进驻浙江嘉善时，与浙江大学英语系教师朱洁华相识，后来两人结婚，感情融洽，生有二子五女。抗战期间，南昌危急时，刘和珍的母亲和她的弟弟刘和理曾避难赣州，住在方其道家中。日军侵犯赣州时，刘和珍的母亲随方其道的妻子儿女一起回到定南老家，刘和理则随某校迁往信丰。抗战胜利后，刘和珍的母亲和弟弟才返回南昌。方其道的子女称刘和珍的母亲“外婆”，叫刘和理“舅舅”，与刘和理的儿子刘小理则以表兄妹相称，双方保持密切的联系。

1945年方其道被选为江西省参议员，未及开会，于1946年春病逝于南昌翹才中学，时任该校教员，终年53岁，灵柩运回定南，葬于车步乡牛皮园小老鸦山。

（转载于《名人传记》1992年6期）

春风化雨忆师门

——怀念黄化鯤先生

钟 鸣 天

我在定南中学三年的初中学习生活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国文教师黄化鯤先生。黄化鯤，字鹏轩，本县城西乡（现为老城乡）水西村人。早年求学在外，毕业于北平高等警官学校。原在江苏无锡一带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南京、苏锡等地相继沦陷，遂挈眷回到定南家乡。先在岵美山矿区任警察局长，旋乃应聘到定南中学任教。此后辗转在文教界工作，直到一九四九年秋定南解放为止。我和黄化鯤先生相处的时间并不长，除了在定南中学接受了他二年半的教育薰陶外，就是他在主持定南中学高砂分校时，雇我在分校当了一年文书。因此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他的一言一行，都给我留下了极为难忘的印象。有几件事，老在我的脑际萦迴，回想起来，犹如昨日，景行高山，令人仰慕。

一九四二年春，我就读于定南中学初中一年级下学期，所有课程几呼都换了老师，国文课就换为黄化鯤老师。他经常穿一身赭黄色制服和紧腿马裤，个子单瘦干练过人，目光炯炯，严肃有神，不苟言笑。但讲起课来却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记得过了“五四”运动纪念日没几天，又逢到作文课了，他出了《春晨》这个非常平凡的作文题。我由于平常课外

喜欢读些诗词，古人的今人的都读过一些，包括课本上的都能背诵如流；加以这学期我在外面亲戚家寄住搭伙，不参加学校的早操，每天清晨起来，即到野外田边路角复习功课，春晨的景色诸如往来于阡陌间的农民、戏游在岗原上的牧童、飞掠在田野上的燕子、农家做饭的炊烟、乃至竹林树上的啾啾山鸟、山岗上哞哞的牛羊、村头屋旁的鸡鸣犬吠，司空见惯，极为深刻而熟悉，闭目即眼前。因而在《春晨》这个题目面前，我略加思索，便写了一首五言长诗，一气呵成，自然流畅。作文时间两节课，我只用了一节课，便第一个交了作业。黄化鲲老师看了我一眼，翻开作文本，一边看，一边嘴唇蠕动着，偶尔还点点头。当他看完后，手还按住作业本，望着我问道：“你今年几岁？”我回答：“十四岁”。待下课后没多久，他便拿着我的作文本和两张作文纸，到教室来找我。他一边打开作文本一边说：“你这篇诗写得很好。是第一次写诗，还是写过其它诗呢？”我说“这第一次学写”。他便指指点点，将诗念了一遍，把两张作文纸交给我，要我誊抄一遍交给他。我将老师修改后的这篇处女诗作，反复仔细地看了几次，全篇诗作在黄老师只改动了七八个地方，而他的评价却那么高，给我的鼓励太大了，我的心情激动之极。修改后的全诗如下：

欲画天难晓，	睡馀梦亦惊。	千家鸡唱早，
百里鸟鸣嚶。	推望窗户外，	太阳尤更新。
呢喃草堂燕，	婉啭弦歌声。	慢步向原野，
残花隐有情。	仰首观天色，	朝霞满布陈。
远瞻村落处，	炊起缕烟轻。	羨彼荷锄者，
来往笑盈盈。	耕耘劳动着，	收获解饥贫。

一幅牧童画， 浩然气吞鲸。 盖我青年辈，
何不迈前程？ 仿那曙光样， 由晦而光明！

末后的批语，也是一首五言律诗：

生龄才十四， 能画复能文。 英敏冠侪辈，
天才独赋君。 学诗初入步， 诗意满江云。
努力毋荒怠， 书成名自闻！

吃了午饭，黄老师便将这篇诗作，加上圈圈点点，后面题上他的评语诗，张贴在学校公告栏上，一下轰动了全校。从此，使我受到极大的鼓励，对古典诗词文学的兴趣更浓了。除国文课本上的古诗古文外，还在课外读了不少古典诗文，并在作文课时学写文言文。我更从黄化鯤老师对这篇诗作的修改中，慢慢领会到作诗的平仄变化，炼字炼句，力求典雅含蓄；为了押韵，有时句式还可倒装，以及诗的语言特色等问题。为以后作诗打下了一些基础。当然，更主要的还是不断学习，不断提高，不断实践的问题。

黄化鯤先生不仅学养深厚，教学认真，在做人的方面也很正直，不畏权势，不媚上傲下，遇到危难事情，敢于挺身而出。一九四二年冬，定中新来一位训导主任李××，北方人，身材清瘦修长，操一口北方话，憨厚朴实。一年级的班长刘××，为了庇护一个犯错误的同学（在教室或厕所涂写辱骂老师的话），与这位训导主任争吵起来。李××要他把这个同学交出来，否则便开除他。刘××硬顶着，说开除我，我也不知道。第二天李××便贴出布告，开除刘××（这是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不查明真象便开除一个学生，是错误的），全校师生顿时沸腾起来。正当大家议论纷纷时，刘××跑到厨房拿了一把菜刀，藏在上身衣内，冲上办公楼去，

质问李××：“你为什么开除我？”不等李××开口，便一刀朝他头上砍去，李××见刀砍来，便扭头一闪，正好砍在脸上，鲜血直流。李××急向楼下逃跑，刘××紧追到办公楼下空地上，继续砍杀。围观的学生中，有的喊杀得好，有的叫不能杀，老师们都齐声吼道：“刘××住手！快把刀放下！杀了李主任，你也活不成！……”而刘××仍挥舞着血淋淋的菜刀，紧追不放，却没有谁敢上去制止他。这时，住在礼堂隔壁的黄化鯤老师，听到喊杀声，急从房里出来，看见这个情景，就不顾个人的安危，几个箭步跑过去，一手把刘××的刀夺下，一手抓住他的右膀，猛喝道：“你疯了吗？杀人是要抵命的！”同时叫人扶着李主任，将刘××扭送县政府。头脑清醒的老师同学们，都齐声称赞黄化鯤有武功有魄力，制止了一场人命惨案。原来，那把菜刀是伙房厨工们丢掉不用的，钝得很，只是第一刀用力猛砍伤了脸。如果刀口锋利，李××早就没命了。不久，刘××即以杀害师长罪，被判有期徒刑七年。

一九四五年秋，日寇投降后，我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选择：历市镇中心小学和月子中心小学都聘我去当教师。历市镇小是廖凯民（是我的图画国文教师）老师介绍的，而月子乡小则是我的家乡母校。两校都要我去教图画和语文两门课。我当时年纪虽小，也颇知一些做人的准则：要真诚对人，在同等关系中，不能亲一疏一，要处理好周围的各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去那一边都不好。如果去历市镇小，就得罪了月子乡小母校；去月子乡小学，又怎么向廖凯气老师交代呢？就在这左右为难的当儿，黄化鯤老师来找我，问我下半年有无工作？我把上面实情告诉他，他断然地说：“两边都

莫去，把聘书退回给他们，到我那里（指高砂分校）去当文书。要是请不到图画老师，你还可以兼教图画课。”这真是喜从天降，不仅解决了我这个左右为难的棘手问题，还给我安排了一个非常轻松的工作。我到高砂分校后，除了刻印讲义和抄写教务方面的表报外，其他的事就很少了。我有大量的时间来练习绘画和读书。每逢上课时间，我房里便安静得很，是最好的自学环境。课余之暇，老师同学都爱到我房里来玩，或看我的绘画，或谈天说地，热闹一阵。真可谓“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段时间，是我在家乡工作中过得最愉快，最充实的时期。感谢黄化鯤先生给了我这个极好的工作自学环境。

黄化鯤先生在主管高砂分校的工作中，是很认真负责的。对于某些人工作不好，吊而郎当，特别是个别依仗权势，只挂名不工作的人，是深恶痛绝的。有个总务员黄浚川是黄冠三的养子，他依仗父亲的权势，对工作马马虎虎，东游西荡，经常找不到他，分校主任黄化鯤伤透了脑筋，学期结束后便辞退他。他因此怀恨在心，候机报复，恰巧，下学期（即一九四六年春）开学很久都请不到图画教师，而爱好美术的学生又要求上美术课，黄主任便在教务会议上毅然提请我代教美术课，得到与会教师的同意通过。于是我便兼任了全校美术课的教学。我兼教美术课后不久，外面便有流言蜚语，说什么黄化鯤赶走了本家的总务员，请来了外姓的毛伢子教美术课，一个初中毕业生来教初中课，根本不够资格，等等。不久，师生回家过端午节，黄浚川便趁机纠集了几个打手，挑着箩筐来找黄化鯤主任寻衅，以索欠学米为借

口，大打出手。他人多势众，黄主任虽有武艺，但一个人赤手空拳，也敌不过他的几条扁担。最后虽把他们赶走了，可身上还是受了几处重伤，左手臂和手指都负伤了。待我节后回到学校，见他吊着绷带，心里非常难过。心想这虽然是封建恶势力的报复行动，但也与黄主任秉公执教、大胆提拔聘用我代课不无关系，那些流言蜚语，就是这次报复行动的先兆。

后来，此事经县政府教育科和定南中本部出面调解，经黄冠三同意（他当时还担任定中校长），由他养子黄浚川办了几桌酒席，请当地乡绅和分校全体老师吃谢罪酒，向黄化鯤主任公开道歉了事。黄化鯤先生经过这次恶势力的打击，也不想再当分校主任了，便向县政府和定南中学本部提了辞呈，改任县民教馆长。黄老师要我也到民教馆去工作，我疾愤于定南封建势力的霸道嚣张，毅然背井离乡，到外地谋生。当我在上犹找到一个栖身之地，写信告诉黄老师时，他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多所鼓励的回信。并说吾乡定南人保守习气太重，安于固守家园，未敢越雷池一步，故类多眼光短浅，不知天外有天，人中有龙。谆谆告诫要勇于向外开拓，广结良师益友，请益问难，互相砥励，力求上进。在黄化鯤先生这些殷切鼓励下，我在外地三年多，边工作边学习，读了不少的书，增长了许多知识，隆师访友，刻苦自励，在诗书画各方面都打下了一点基础。一九五〇年二月，解放后的第一个春天，我回定南县城举行了一次画展，同年暑假，我第二次离乡背井，千里迢迢，只身来到武汉考取了湖北省教育学院美术科。五二年全国院系调整，湖北省教育学院美术科合并到华中师范学院美术系，我于五三年七月毕业，留系

任教。以后虽经历了许多的沧桑变化，个人遭遇一言难尽，家乡的情况一无所知，但四十多年来，黄化鯤的形象总在我脑海中闪现。在青少年时期，他对我的教诲栽培，始终未能忘怀。我六四生日时写过《诞辰六十忆家山》二十多首诗，其中有二首是怀念黄化鯤老师的，现抄录于后，作为本文的结束：

慧眼怜才黄化鯤，爱余“能画复能文”。一篇诗作频圈点，轰动校园远近闻。

春风化雨忆师门，提携栽培没齿恩。四十余年萦梦寐，伤心何处为招魂！

“山牛客”

地处归美山脚下的一个小山庄——中隔，居住有八户人家。因为是山区，经常有山牛、野猪糟踏农业生产。为了保护生产，男劳动自动组成一个打猎队。当时没有弹枪，只有鸟铳。先是五、六个人，后来逐步扩大有黄达成、黄章炎、黄德海、陈月金、陈家德等十多个人的队伍，使用的武器也逐步改用弹枪（步枪）。我们抓住时机，勤学苦练，练成了白天能打飞鸟，晚上能打香火的神枪技能。哪里发现了有山牛、野猪为害生产，有请必去，去了必猎，几乎百猎百胜，经常活动在三亨地区、广东省的岭岗、大坝、热水、浏源、上坪、龙南县的南亨、桂湖、塘口等地区，“山牛客”一名也由此而闻名当地。

我们打猎是作为一种职业，哪里有请就到哪里去，去了都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和热情接待。我们在实践中发现，山牛、野猪有一定的活动规律：山牛一般藏在深坳和芒秆山中，出走时大多数是过坳或者出坑；野猪一般藏在阴埂咀或灌木丛中，热天也会藏在深山坑内，走向是过坳、出排或在本山上下周旋；母猪的活动更为呆板，操山的在山脚下进，它就在半山出，操山的半山出，它就山脚下进，往往被等返堂的猎手打中。操山的一般是一个人，只带刀不带枪，不论晴天雨天，只要猎物踏了一根草、一粒石子，都能分析出它是何时走动的，然后跟着脚迹搜索前进，随时叫喊（报告）山牛、野猪的走向。等堂（狩猎）的跟着操山人的叫喊，机

动地转移位置。打的时候要掌握慢走快打，快走慢打的规律。山牛、野猪如果发觉后（操山的追着了它）跑得很快，过坳或过埂时都会停步几秒钟，探听动静，这时是打的良好时机。当听到是走来的，它就边走边听动静，这种情况就要快打，一发现就要打，不然快过坳或过埂时它就跑得很快。打时一不能包青打，二不能当埂打，以防误伤他人。群众都知道，我们打猎是有把握的，因此，当地听到枪声时，都会在家烧水等候。我们所猎取的山牛、野猪，除给房东的开销外，其余的按人平均分配。

我们除了打猎，保护农业生产外，对维护社会安定也尽了一些责任。解放前，广东方向有些经济土匪，有时窜到山区来捉妇女出卖，要女方家属出高价去赎人。有一年冬天，三亨横坑黄××、廖××、陈××等五个妇女去岵美山捡钨砂被土匪捉走，“山牛客”成员黄达成、黄德海等人持枪营救，开枪打掉土匪的帽子和打烂土匪的衫袖，迫使土匪放人，此后三亨地区就没有发生过土匪捉妇女的事件了。

一九四五年春，三亨乡公所就把我们组织起来作为地方武装，名叫东防队，主要任务是对抗日本侵略者。那年夏天，日本兵从广东岭岗出发，欲路过三亨。他们抓到响导，问三亨有没有部队。响导说，三亨有山牛客，人人会打枪，百发百中。日本兵听后改道羊陂，使三亨民众避免了一场劫难。

解放前夕，东江游击队在三亨等地活动，山牛客时与他们相遇，双方都很友好，相互关照。游击队曾邀我们去攻打广东的一个乡公所，我们答应前去，只因信息中断未去成。事后发现信息是被黄为望（有时同山牛客一起打猎，解放后

划为反革命分子)中断时，大家都指责他不讲义气。

一九五二年，黄章炎等山牛客在本地打猎，当操到三亨岗背斜地方时，发现山窝里有火烟，他们猜想可能是三亨的逃亡反革命分子黄为望藏在那里，当即由黄章炎一人前去聊天，其余逐步缩小包围圈。果然是他，于是乘其不备，当场抓获了这个逃亡二年多的反革命分子。这种大义灭亲之举，得到群众的好评。

(口述人：陈月金、陈家德

记录人：欧禹章)

衣橱门带来的回忆

谢觉凡

我家有一蹲妈妈结婚时用过的旧式衣橱，虽历时一百多年，但还很结实。因不合时新，前几年用作菜橱，天天屹立在餐桌旁。每当看到它那累累伤痕的两扇门，抗日战争时期“国军”败退南逃的情景，日军进犯家乡荼毒生灵的惨状，便浮现在眼前。

那是四十六年前的事了。

不抗日、向南逃遁

1944年春末、夏初，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余汉谋部，开始南逃。广大农村征伕频繁。名义上为“国军”运送军用物资，而更多的是用以抬官太太、挑军官们私人的财物。公路上天天马乱兵慌，怨声载道。

当时，留村、汶岭两村均驻有十二集团军的后勤部队。石官背新围驻“军需处”，珠光背驻军医处。军官、医官都有随军家属。住在我家上屋的理发兵，也带老婆。

1945年老历三、四月间，国民党部队纷纷南撤，余汉谋本人也坐着四人抬的藤轿，经鹅公往寻乌方向逃之夭夭（那时我在鹅公乡搞土地丈量）。为阻止日寇追击，汶定公路沿线桥梁焚烧殆尽。“国军”的军用车辆无法通行。自文昌至汶岭，沿途摆满了军车和民用货车。堆积在珠光背墩下的军衣

和封存在汶岭油寮下的弹药，来不及运走，只好留下少数兵员看守。四月下旬，驻军全部南逃，日军还未入境。斯时也，广大城乡既无“国军”骚扰，也无日军掳掠，安静异常。“福亏祸所伏”，这暂时的安宁，预示着劫难的来临。

避劫难、隐迹深山

因不堪国民党抓伕、征兵的徭役之苦，加之预防日军的入侵，公路沿线居民于1944年冬开始疏散。我们汶岭村住户，分别于牛牯寨、牛寨、大步山等地扎山棚。留村百姓则在粗砂坑、杉毛塘、青云山一带盖茅舍栖身。也有不少人寄住于樟田、井里、关西上坑底亲戚家。

一九四五年四月下旬，抗日前线战事吃紧，风闻日寇即将入境。青年男女和老幼进入深山，过着茅舍、柴扉、席地、夜炊的生活。真可谓“时挑野菜和羹煮，旋砍生柴带叶烧”。偶闻犬吠或夜半婴啼，都会使人胆颤心惊，惶惶待旦。公路上车辆不行，行人稀少；沿线村庄，炊烟不起。只有不知人间大祸将至的鸟类仍在天空飞翔。

狼入室、生灵涂炭

我一家五口寄住于樟田姑母家，只留父亲一人在家照料。古历五月初四日下午，我回家取米。当晚，父子二人提前过了“端阳佳节”。第二天早饭后，我和几个年轻人站在屋背山上瞭望，只见公路上有五六个兵由东而来，并向我们开枪。我们急忙绕过山梁，从山背后登上山顶，隐身在密林中。看见村东头有大队人马，打头的擎着太阳旗（日本国旗，人们贬称膏药旗），才知道是日军进村了。自文昌阁至

留村，公路上浓烟滚滚，火焰冲天。鬼子烧汽车了。不一会，我们汶岭村所有房屋驻满了鬼子兵，仍有大部份向汶龙开去。从此，劫难来临了。我有家归不得，只好朝樟田而去。

约五天后，盘踞在留村、汶岭和汶龙一带的鬼子兵，全部撤往龙南、信丰。村民们陆续回来了。劫难过后的情况，非语言所能形容。家家户户门窗破碎、残缺，稍好的衣物被掠夺一空。马粪到处是，马尿遍地流。来不及转移的牲畜，悉遭宰杀。毛茸茸的猪头、牛耳、猪脚、牛蹄随处可见。屋前屋后即将收割的水稻成了光秆。稻穗全被日军割去喂马了。东家说酒缸中有尿，西家说棉被里包着粪。臭气处处可闻。村中钟××五十多岁被强奸，泮贤一老人陈××行走艰难，被鬼子兵刺死，推在竹坝桥下。被抓去当挑伕者的家属呼天唤地，哭声此起彼伏。公路上一辆辆汽车，已成为一堆堆赭红色钢架，匍匐在公路旁，似乎在向人们诉说它们惨痛的遭遇。

日军掳掠过后的悲惨情景，实乃目不忍睹，耳不堪闻。昔日的传闻，已成现实，展现在人们眼前。

日军所到之处，不仅奸淫掳掠，而且还四出抓人，充作挑伕。我们汶岭村被抓去的，有谢立培、谢立桥、谢行芳、谢西臣和我父亲。我父亲一生教书，可谓手无缚鸡之力，加之胃病缠身，哪堪苦役？走至汶龙新岭，脑门上被日军猛砍一刀，推在路旁水沟中。他装死挨到傍晚，摸黑走到地背亲戚家，经抢救当时虽然脱险，但因流血过多，病情加剧，于同年十月含恨与世长辞。此外，留村也被抓走不少人。瑤上何芳波走至汶龙罗坝，惨死于日军屠刀之下，其堂兄何芳文

被刺伤腹部，直至解放前夕，伤口还流脓不止。肇基窝谢贱狗，年逾六旬，葬身异乡。

杀鬼子，虎口逃生（注①）

珠光背大丘妈的谢行芳被日军抓去，随军驻在汶龙上庄，天天为日军割马草、砉谷碾米。一天下午，他跟随一个鬼子去脚碓寮下踏米，乘鬼子舀米之机，一棒击中鬼子头部，敌人倒地，逃了出来。走至江夏又遇上一个割草的鬼子。双方展开一场肉搏，鬼子欲抓住他，他将鬼子打昏后，绕山路逃回家乡。消息传开，村中老幼都去看望这位“抗日英雄”。他虽然“凯旋归来”，却遍体鳞伤。谢行芳当年打死、打伤鬼子虎口逃生的事，至今仍流传在汶岭村中。

降倭寇（注②），普天同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喜讯传来，县城下历司以及全县各圩场，鞭炮齐鸣，热烈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广大城乡沉浸在欢乐之中。不久（记不清哪一天），县城召开了有驻军参加的“定南县各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大会”。“司令台”设在今县人民银行对面。大会开始，盆形冈顶上（今县自来水公司所在地），两门迫击炮齐鸣，一直到大会结束。“司令台”上县党政官员和驻军代表（十二集团军参谋长徐景堂）先后讲话。县城各机关、学校和部队，扎彩门，贴对联，一派节日气氛。

然而，时过不久，广大人民又处于三年内战的水深火热之中。直至一九四九年解放，广大人民才扬眉吐气。

注：

①鬼子：日本兵的贬称

②倭寇：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屡次骚扰抢劫朝鲜和中国沿海的日本海盗。

本文是指日本军国主义。

日寇残害下的月子江

李 房 宗

民国卅四年（1945）农历五月初四日，从广东北甯之日本侵略军侵犯定南县城后，其中有二百余日军官兵在毫无抵抗的条件下，泰然跨过天然屏障之神仙岭，当天下午到达岭北之中心月子江（现月子乡所在地），并驻扎在月子中心小学。在日军到达之前的二、三天里，月子以及附近几个村庄的老百姓，多数已经躲进深山老林搭棚栖居。梅香村人搬到三头松、砾上，月子圩人、迳头方屋人往楼背、高沙塘，下圳人往高嶺背、含湖，玉石人往长面排、石迳山，大屋人往塘凹、盐前水，含水迳人往猪盆山、龙华山。他们都在深山密林中避难，根本谈不上欢度五月初五的端午节。

日军侵犯月子后，到处进行搜索。找到未运走的大米、油盐等食物，统统掠光；见到大小牲畜，全部杀光。老百姓的鸡鸭一般已搬进山里，肉猪多在端午节或节前一、二天宰食了。母猪留在家里，让其在栏外自找野食，日军见了就用刺刀杀死，将胎内小猪丢在河里。

老百姓躲进深山，白天不敢烧火做饭，总是在天亮前做好一点饭菜，权且充饥。日里他们忧心忡忡，登上高处，坐在树底下或草丛中，时而叹息，时而盼望自己可爱的家园。广阔的村庄、田野，无人走动，鸡犬无声。只见三、五成群的日本兵，手持刺刀，进出各个屋场搜索。夜里他们露宿在林中，

婴儿的哭声，野兽的哀嚎声，催人泪下；累遭狂风暴雨，衣着淋漓，更是凄凉。饥寒难度日，有家不敢归，多少人禁不住泣不成声。

五月初七日上午，十多个日本兵押着在饭店街开客栈而未逃走的方石头去玉石村搜索。他们在玉石村水口枫树下围里未搜到什么，又逼方石头带路去垮背围。当他们发现该围屋堆满军用弹药后，便将几十捆柴草塞进围门口。随即又到杜屋存放弹药的屋里，同样备好柴草。日本兵认为寻找弹药库的目的已经达到，便将方石头押回枫树下围内，拿绳索将他绑在楼梯上，用刺刀将方石头刺死。尔后，日军再到垮背围和杜屋点燃柴火，点燃后，日本兵又回到其驻地月子小学。当天下午四时，垮背围一声巨响，紧接着密密麻麻的弹药爆炸声不停地响了一个晚上，数千箱弹药毁于一旦，硝烟笼罩着整个村庄。第二天上午，人们从山上遥望，石墙结构坚实的垮背围竟成了一块废墟。该屋的居民跪对青天，誓骂日贼。

因为饥寒，被困在山里的群众冒险潜回家中，或取点衣物，或取些米菜。有些人来不及躲避被日军抓住。月子附近被抓住的村民计有：刘同仁、何芳林、李世良、李运狗、李太辉等十多人。日军撤退时，他们被逼沿途为日军牵马、挑担、做饭等等。日本投降后，他们才先后从南昌等地返回家乡。玉石村的李运狗被抓走后，一直下落不明。

日本侵略军在月子践踏的七天时间，正值收割早大豆、播晚稻种的季节。农民不敢回家收种，误过了农事。加之日军的马匹肆放在外，任意吃食早稻、豆类等农作物，农民损失巨大。有一匹特别高大的军马，因过食黄豆，胀死在下坝

路旁。

五月十二日，日军撤出月子，经迳脑、信丰方向而去，村民们陆续返回家园。月子圩满街腥臭，沿河边上残留着许多牛头猪肠，青头苍蝇麋集其上，令人生畏。月子小学遍地是大小粪便，臭气冲天。村民家里的门窗、东西被毁坏，正在扬花结实的早稻，被日军视为牧草，任其军马践踏……种种杂乱的景象，不堪目睹，人们永远也不会忘记。时至今日，社会上如出现了某些杂乱情形时，人们往往用“好象过了日本鬼子样”的词句来加以形容。

东南军袭击月子乡公所

李 房 宗

《定南县志资料选编》第四辑刊登的定南“东南军”史料，曾提及到“东南军”攻打月子乡公所的事，但未详述。本刊发表此文，权作补充。

——编者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农历八月初十晚，东南军官兵约二百人，经留村（今修建）、犁坑、上坑至八十岗，趁车步乡公所之不备缴了其枪支后，随即北进马长洞（今梅香）过楼背，于十一日清早到达月子，布防在老鼠塘背后的山岗上。上午八时，其前锋四人一伙，间隔十余丈，从月子下圩圩口跑步沿街直上，经圩尾茶亭过桥，至月子乡公所围墙边，即朝乡公所门前连开十几枪，其时乡公所人员正在吃早饭，被门外枪声惊动，立即回房拿枪，严阵以待。东南军前锋四人摸进乡公所大门，不见有人，便往左侧楼梯上楼，企图收缴枪枝。上到一半，乡警卫干事李××从楼门口向下开枪，打中一名。余三人即背扶伤者出门，退到茶亭桥下草坪里。乡公所人听无动静，便紧闭大门，坚守在内。东南军全部人马陆续开进月子圩，由当地早已暗中参加了东南军的李××迎接，驻扎在饭店一条街。其头目们住在李××店前桥

头的一间小店里，其中身挂“马龙头”装束、头戴军帽、操南康口音的，名叫赖 湘。上午，东南军一些人冲进李宜春（当年月子乡公所乡长）的横江商店，店中人员已出走，店内衣物、布匹任人乱拿。

东南军未缴到月子乡公所的枪支，反而伤了一员，极为不满。头目们与参加了东南军的李××商量对策，找来地方绅士李××、李××，要他俩人去同乡长李宜春交涉，一要给钱，以赔偿打伤人员之损失，二要交出乡公所全部枪支，否则，就“踏平”乡公所。李宜春开始表示很强硬，说要钱要枪都没有，要打就来。后经两位绅士多番劝说，月子乡公所才从大门脚下塞出一些钱和一支步枪（单响快）。东南军虽不满足，但又不敢贸然攻打。于是，一方面派人抬伤员回家（途中已死），一方面调遣人马从跑马岗、徐屋山一带包围乡公所。他们没料到，乡公所的人员，在双方谈判期间，已分批从后门撤走，至傍晚乡公所已空无一人，全部撤到小砾（今长隆）李宜春家里去了。李宜春还派人通知各保，要各保的民枪做好随时打击东南军的准备。

八月十三是月子江圩日，东南军在岭北商店门口贴出一张毛笔书写的布告，大意是说东南军的宗旨是为了打倒贪官污吏，号召民众起来抗丁、抗粮。下午，他们预感李宜春的地方民枪队和县保警队会来袭击，考虑安全起见，撤离月子圩，当晚转驻下圳围。

国民党定南县政府得知东南军袭击月子乡公所，急电赣州专员公署。专署保安团奉命进剿，在定南县保警队的配合下，于十三日晚上到达月子楼背，占据了笠麻岌、方屋背夫等至高点，并在楼背岌、老鼠垅、牛牯石、牛头丘布阵，形

戒半月形包围下圳围。次日拂晓，保安团主动发起攻击，炮声、机枪声、步枪声响彻云霄，炮弹时而落在围屋的炮台角上。东南军则从炮台眼里朝对方射击。石背（玉石）杜屋的李世赞在老虎坑放牛，牛被乱枪打死。下圩开粉店的赖石元（龙南人）、一位挑盐贩的过客（不知姓名）均死于乱枪之下。东南军死守下圳围，并在下圳背夫拉开阵势，与保安团形成东西对峙。双方整天隔江远射，不甘示弱，但谁也不敢越过雷池一步。月子圩上和附近村庄的人，因怕乱枪所害，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学校、商店从早到晚没有一人走动。被乱枪打坏的墙壁和瓦面不计其数。日落黄昏，枪声密度逐渐减弱。是夜月色透明，交战双方仍然朝对方放“冷枪”。至下半夜，东南军唯恐抵挡不住更大的围剿，乘月光趋暗，由李××、李××、李××带路，悄悄地撤出下圳围，经宜坑开往含湖，尔后开往迳脑。

东南军在月子四天，保安团与之交战一昼夜，双方伤亡甚少，消耗的是大量弹药。然而，当地老百姓却未得安宁，深受其害。

羊陂歼匪记

欧阳杰

民国初期，广东和平岭岗的土匪常来定南边境骚扰。乡勇民团纷纷起来抗争，维持社会安宁。据上一辈传言，羊陂之战是较为典型的一场民勇歼匪之战。

1918年（民国7年）春，岭岗土匪头子陈日阳（外号老鼠日）纠集匪徒数百人，携带鸟枪、小洋炮等火器，途经三亨左拔，于旧历4月中旬抵达羊陂，欲报数年前该匪部途经羊陂时遭当地民勇痛歼之仇。

羊陂团总欧阳峰获悉上述情报后，立即召集民勇与之抵抗。他把妇女、小孩和部份民勇集中在毗邻广东和平三乐村（约二华里）船形围。船形围是较为坚固的围屋，三面环水，便于防守。4月17日，陈日阳匪部到达羊陂后，即围住船形围，扬言要斩尽杀绝。并在船形围后面挖地道通向围屋内，准备晚上突袭。团总欧阳峰得知后，即将民勇分成四个队，一个队正面出击；一个队绕至土匪后面，断其退路；另两个队左右包抄，对敌人形成反包围。天一黑，民勇主动出击，先发制人。鸟枪土炮一齐开火，把土匪打了个措手不及，晕头转向，东逃西窜，各奔生路。是夜倾盆大雨，河水猛涨，有些匪徒掉入河里被淹死。匪首陈日阳逃回岭岗后，被是时的和平县政府当局抓获，予以正法，余匪悔过自新。从此岭岗股匪被肃清，毗邻岭岗的定南边境免去土匪骚扰。

关于县治迁移之我见

刘 瑞 林

定南县志（1990年版）载：“民国十六年（1927年）秋末，高砂黄、廖两姓发生械斗，县衙被焚毁。县治始由莲塘（今老城乡政府所在地）迁移至下历。”

笔者认为，县志所载之事，虽然流传至今，但“县治由莲塘迁移至下历”的真正动因却是当时的工农革命运动。根据有三：

一、工农运动震撼县治。1926年3月，在赣南革命斗争形势的影响下，木匠廖慈林、廖际焕等人，在莲塘组织了木工、泥水工、理发、缝纫等行业工会，这是我县手工业工人团结起来反对老板压迫剥削的工人运动组织。同年11月，定南在赣州第二师范读书的廖嘉美（后易名廖希亭）、在赣州第四中学读书的廖绶祥、廖成美，考取了中共赣州特支在赣州市西津路广东会馆举办的“赣南农工干部训练班”；随后，定南天花寺的缪朗如、曾庆芬和老城的黄章升等三名知识青年亦被保送到该班学习。次年1月，他们在该班结业后，接受中共赣州特支的安排，回到定南县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宣传苏联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实行二五减租、废除苛捐杂税等革命道理；介绍赣南各地组织工会、农会的好处和做

法，在中共党员鄢一心（又名鄢日新，中共赣州特支特派员）和廖光泮（赣南农工干部训练班毕业学员，派在龙南开展工农运动）的指导和帮助下，相继在莲塘成立了“定南县农民协会筹备处”和“定南县总工会筹备处”。“定南县农民协会筹备处”设在西花厅，由主任委员廖嘉美、委员廖绶祥、廖成美、黄章升、缪朗如、曾庆芬等五人组成。该处在彭家祠举办了“定南农民干部训练班”，为定南的农民运动培养了55名骨干。“定南县总工会筹备处”设在考棚内（旧时科举考试的场所），由32名各行业工会会员公推廖慈林为主任委员，廖滔古、廖锦文、廖际焕、廖松英、黄门生、廖森尧等人为委员。该处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并作出了如下决议：（一）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方针政策，宣传安源、浮梁工人运动的经验。（二）积极发展工会会员，扩大工人队伍。（三）组织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要求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提高工人的工资，反对资本家打骂工人的暴行。

“定南县总工会筹备处”和“定南县农民协会筹备处”成立后，领导工人、农民开展了斗争，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廖慈林带领木工、泥水工向“万合号”、“大通社”的老板林文石提出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遭到老板拒绝后，二百多工人罢工两天，迫使林文石将工人的日工资由两毫洋提高到两毫半。县政府职员郭建勋因支特“定南县农民协会筹备处”的工作被县政府解除公职后，农协筹备处组织莲塘几十名农协会员和农民干部训练班的学员到县政府说理。县长周文矩迫于民众的压力，恢

复了郭建勋的公职。

莲塘农民在农协领导下，反对地主年关逼债，拒绝向地主交“田信礼”。通过这一斗争，地主黄开先不敢到旱窝里向农民逼债，国民党定南县党部委员、地主廖鉴平不敢向廖锦春等农民要田信礼。

县志第11页载：“1927年10月23日，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鄢一心（中共党员）、定南县县长周文矩召开县民大会，民意公决三亨区与县党部武装接触问题。”

以上事实表明，工农运动直接震撼着县政府的统治。

二、《中共江西省委关于近周政治报告（李干生1927年12月21日）》文中第四点称：“最近，赣州的定南县农民已占领县城。大余的农民亦受广州暴动的影响，大有进攻县城之势”。这里所称的“农民已占领县城”与“1927年秋末（农历10月）发生的黄、廖两姓械斗”，其实质是农民运动反抗官府、攻占了县城，只是官府在镇压农民运动时蓄意制造和利用了黄、廖两姓的矛盾而已。

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朱德年谱》第五十页第二段称：“1927年南昌八一起义后，同年10月，朱德率余部从广东回师赣南开展农民运动时，途经定南”。定南当时的农民运动所以如此火红，乃之占领县城，迫使定南当时的县治不得不由莲塘迁移至下历，这与当时的整个革命形势是紧密相联系的。

以上浅见，欢迎读者赐教。

粤东盐务局始末

廖英美 廖振洲

抗日战争时期，北方的食盐甚为紧缺。当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取接力驳运南盐北调的办法。将食盐从广东沿海一带运往北方。其时交通落后，车辆甚少，尤其是山区，主要靠人力挑运。为了交接方便，沿途每隔六、七十华里的地方，一般都设立食盐转运站。

民国二十八年（1939）老城始设“老城食盐转运站”，站址设在老城圩南门外河边的真君庙里，（现老城搬运队住地），因与广东毗邻属广东省管理。站长廖性南，总务长廖受祥、运务股长廖嘉美，加上三、五个职员，总共七、八个人。

随着运盐数量的增加，盐务工作日益繁忙。原站址盐库狭小，门口又无较为宽阔的坪地，为改变这一拥挤的状况，站址于1942年迁至迎阳桥边一侧（今定河桥老城供销社化肥仓库址），并于同年升格为“粤东盐务局”。局长廖受祥兼总务股长，职员有谢玉山、廖英美、周之礼等人，运务股长廖嘉美，司秤员、记码员有廖三阳、谢郁轩、廖庚奇等，会计股有廖成美、徐根敏、曾也萍以及几个外地人，盐警数人，共十余人。

为了组织好运盐工作，老城公路沿线的村、保都指定一名民伕队长，负责运盐的具体事宜。当时的运输工具，主要

是靠人力担挑，有的人使用单轮手推车（俗称“鸡公车”），也有少数人用马驮运。那时民众生活贫苦，常来卖力挑盐，每天均有二、三百人。民伕将盐运至目的地，凭盐票结算力资，虽然微薄，也好买米糊口，以持生计。尤其一到农闲季节，前来运盐者更为众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夫妻作伴，全家出动，公路上人来人往，人流成线，木车成行，可谓壮观矣。

1944年，西岸盐务局（注）并入粤东盐务局，黄庚三任局长。1945年六月间，一小股日军从和平路过老城时，纵火烧毁盐库及其办公楼房，粤东盐务局也就随火而消亡了。

注：西岸盐务局，1936年设于老城西门彭家祠，是专门收盐税的。

“国大代表”竞选奇闻

（根据李房宗、东平、黄爱仁
来稿和有关资料综合整理）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我解放区发动了疯狂的进攻。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蒋军侵占了我晋察冀的首府——张家口。为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蒋介石就在当天下午下令召开一党独裁的伪“国民大会”（简称伪“国大”）。（注一）

蒋介石所以要急急忙忙地召开伪“国大”，一方面是妄图在伪“国大”上通过一部伪“宪法”，使他的反动独裁统治“合法”化，使内战“合法”化，另一方面是通过召开伪“国大”组织政府，用高官厚禄来拉拢收买中间党派（所谓“第三方面”），以孤立中国共产党。因此在伪“国大”召开的前夕，国民党不惜用大量的金钱和高官厚禄，对中间人士进行收买。在这种情况下，想捞一把的青年党（注二）、民社党（注三）和一些所谓的“社会贤达”纷纷落水，参加了伪“国大”。

十一月十五日，伪“国大”在举世咒骂声中于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开幕，出席的代表前后共计一千六百余人，全部是圈定、贿选产生的。其中国民党占了百分之八十五，青年党、民社党各分得一百六十七个名额。这一大

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军阀买办、政客党棍、特务打手和无耻文人，麇集一堂，在吵架聊天、看《七侠五义》、吃零食以至聚精会神地数钞票中开了四十一天的会。十二月二十五日，通过了一部伪“宪法”（注四），大会草草收场，宣告闭幕。

为了猎取一份权势，进而飞黄腾达，小小的定南县也同各地一样，演出了一场竞选“国大”代表的闹剧。当时，南京给定南的代表名额只有一个，而先后挂牌参加竞选的头面人物却有黄某（代表民社党竞选）、李某（代表社会贤达竞选）、张某（代表国民党竞选）、何某（代表青年党竞选）、黄某（代表青年党竞选）等九人。他们为了击败对方，竟然使出种种伎俩。竞争之激烈、手腕之卑污，可谓淋漓尽致，丑态百出，暴露无遗。

蛊惑人心：竞选一开始，各个都凭借地方势力和种种关系，将自己的学历、履历、职务等加以粉饰整理，印成传单，在县内广为散发，单制作标语到处张贴，诸如“黄某德高望重，可投他一票”、“黄某年青有为，应投他一票”、“选某某当国大代表，可为定南百姓争光”等，城门口、圩门口、大街上、路口通道上到处可见。与此同时，还唆使亲信、朋友、门生故吏、宗支人等四处游说，为其吹捧，或放出恶风，引诱威胁，软硬兼施。李某长期旅居外地，其竞选事宜，全由李姓氏族委员会出钱出力，一应俱全。

鱼肉亲支：竞选人在县内各地设立酒肉站（名曰：“竞选参谋部”、“‘国大’事务所”），专门宴请亲朋宗支。对于亲戚、朋友、族间绅士、持票支持者（当时的选票名誉上是分给每个公民，实际上是由少数权势人包揽掌握），他

们“请”字当头，请他们为其出力拉票，感谢他们为其效劳。有些人脸皮厚，趁机大饱肚福，一日三餐，天天到场，说上两句好话，酒醉肉饱，倒也自在。狭意的东道主虽然有点‘那个’，为了多得一张票也只好笑脸奉陪。特别是逢圩，新城、老城、天花、月子、鹅公等较为集中的酒肉站，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宴席不下三十台。酒肉站阵容最大的要算李某、黄某、张某三人。李某家资万贯，氏族支持，用钱不在话下；黄某除自有资金外，还向外求助，一次就从亲家（民社党要员）那里获得法币两千万元；张某为拉选票，一次就耗资法币四千多万元。

胁迫投票：张某为猎取热水圳、百箩排一带张姓的选票，竟然大开张氏祠堂门，当众宣布：不许张姓走漏一票，如有走漏选票的族丁，立即逐出族门。下历有些地方，凡来投票者必须在票上写上黄某的大名，否则不准投入，或干脆撕作废票。月子含水高陂下黄屋绅士黄某手持十多张选票，心发慌，手发抖，当众声明：“我身为黄姓，也得给（黄）某某兄两票，其余全归（李）某某先生。”说罢，将选票一一给李姓主持人监看后才投入票箱。谭庆乡乡长黄某本想为本姓竞选头人效劳，但在选举之日眼看形势不利，李姓大有获胜之势，竟然不主持选举。李姓得知此情后，立即召集民枪队员五、六十人开赴迳脑（谭庆乡公所所在地）挟迫黄某就范。黄某之父见势不对，大为吃惊，含泪劝儿：“你还不赶快交出去选了这下，月子江来了几十人，眼看你就会吃大亏呀！”无奈，黄某只好草率地主持选举。

利用矛盾，击败对手：张某是天花的坐地虎，在竞选得票上本应占上风。而高砂的黄某却利用张某与曾姓的矛盾和

张在天花横行霸道的事实，大造舆论，击败了张，获得了天花的多数选票。

投机钻营，结党营私：黄某原是国民党员，按理应代表国民党竞选。但因其亲家徐某是民社党的要员，在核定民社党的代表名额内有圈定（指定）谁当选的权力，因而黄某退出了国民党，以民社党的身份参加竞选。竞选结果，黄某的得票数虽然少于李某，但黄某是代表民社党出选的，因而仍被徐某圈定其作为民社党在定南当选的代表，获得了当选证书。李某的得票数虽然多于黄某，但因黄某已被圈定，名额有限，故尔未获得当选证书。李姓不服，将竞选结果电告南京政府，请求“明断”；南京政府复电，李某亦同时出席“国民代表大会”，坐旁听席。据当时的商会透露，李某和黄某在南京开会之余还因此相互数落，吵骂了一通。

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定南县，经过一场勾心斗角、你讹我诈的竞选闹剧之后，九人出场，众败俱伤，一个名额，两人出席，真可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给后人留下了一番笑料。这场竞选，不但没有给百姓带来什么好处，反而加深了民间姓氏摩擦，加剧了定南封建统治内部派系斗争。

注释：

一、本来，根据一九四六年一月政协决议的精神，国民大会应当在内战完全停止，政协各项决议已付诸实施，人民自由权利已获得保障之后，由改组后的各党派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来召集，而当时国民党方面也曾向政协保证：决不召

开一党包办的分裂的国大。可是，蒋介石在攻下张家口之后，竟然自食其言彻底撕毁政协决议，悍然下令召开伪“国大”。

二、青年党早期创办过“醒狮”周刊，被称为“醒狮派”，群众骂他们为“狮子狗”。

三、由原来的国社党和海外“民主宪政会”合并而成。

四、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郑重声明：蒋记国大和它们制定的蒋记宪法均属非法和无效。民盟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和全国许多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都先后发表声明：绝不承认伪“宪法”。在国际舆论界，包括美国的舆论界，也嘲弄伪国大的召开，是蒋介石的“一局输棋”。

封面设计：正文
缪军

定南文史资料
(3)



定南印刷厂承印
1992年9月